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3月30日第15期

## 本期目录

### 蓦然回首

谢声显 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黄肇炎 “革命化”的春节

### 书海泛舟

史云 作者与编辑的对话——《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代前言

丁凯文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前言、后记

何蜀 筚路蓝缕 填补空白——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修订版前言

### 阅史漫笔

胡鹏池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周孜仁 从乌蒙山到泰晤士河

### 故纸堆

庄菁瑞提供 文革前夕的一篇科研成果报告

### 编读往来

作者冯锡刚来信订正

李晓航谈文革文献资料分类

---

### 【蓦然回首】

## 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谢声显

### 抢公章的闹剧

1967年“一月风暴”中，1月29日，四川省万县市（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和万县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今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造反派夺走地委、专署的公章和钢印，宣布地委、专署必须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工作，致使地、专机关完全瘫痪。随后，专区各县（市）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相继被夺权。

1月25日至2月2日，短短几天的时间，《人民日报》为各地夺权而发表的社论便有：肯定山西造反派夺权的《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青岛夺权发表的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为贵州省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而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地在夺权，热闹得很。

我当时只是个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的临时工，因出身资产阶级而从小便挨整，就没敢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打定了主意只站在岸边观涛，决不下水弄潮。因未介入其中，就不知道外地大城市那些造反派夺权是否真是《人民日报》所述能使革命彻底、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记得是在1月下旬，我上白班，厂里传说赤旗派（造反派学生组织）要在今天夺万县市委、市人委的权。我毕竟还年轻，对新奇的事儿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车间里拖着沉重的原粮袋子时，我就心痒难耐。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儿是一回事，真要在身边发生了，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地、专当局拥有军队、警察的“权”，就真会这么轻易地被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夺取？我很想去亲眼看看这旷古难遇的稀奇事。但这份工作我很珍惜，不敢旷工也不敢早退。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终于下班了。我连脸都没洗，穿着粘有米糠的工装就出了厂门。没用10分钟，我便跑到了环城路的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当时省地县乡各级政府都不叫政府，而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的大院里。这古时的县衙门内冷冷清清，几幢解放后新建的大楼全都门窗大开，办公室里桌椅歪倒，满地的文件纸张。眼前场景，只在电影中那些仓皇撤退的镜头里见过。大院里，除了几个跟我一样跑来看稀奇的家伙外，就没再见到什么工作人员。可能这儿的权早就被夺了，我想。

我一路小跑，过了万安桥，登上大石梯上了东方红广场，直奔旁边的中国共产党万县市委委员会。远远地便看见市委大门外围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人在吵吵嚷嚷。这儿的热闹还没完！我暗自庆幸，急忙跑了过去。由于我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便有趣地不敢挤进人堆里，只在旁边站得尽可能近点，听他们吵些什么。听了一会儿，好像都是几个组织内的矛盾，外人不明究里。

此时，便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穿一身旧军装的青年从大院里面朝外挤。他长满青春痘的圆脸胀得通红，双手护住怀里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挎包。我以前在好几个大会场上远远地见过主席台上的此人，知道他是一个国营大厂的造反派头头。

就听有人在喊：“各部委的公章全装在他包里了！”

有人就笑着伸手作抢夺状，还有人叫：“拿出来我们摸一下！”

但也有一批人保护着他，一番推搡，开出一条人巷，然后就拥着那一书包公章跑掉了。

这就是夺权么？我脑袋里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一个青年工人，将那些木砣砣公章夺去能作什么用？手中有那些木砣砣，他便有权发号施令了？别人都会听命于他么？

被主流媒体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大夺权，我这个局外人亲眼目睹的仅此一幕。我以为不过是一场闹剧。

### 万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落函事件”

2月14日，万县市又发生了一件影响运动进程的大事。

城里的赤旗派和红色派（官办学生组织“东方红”及各行业中与之同观点，均以“红色”为名的保守派组织）还可以闹个势均力敌，但在农村，由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成立的“红色贫下中农战团”就占绝对优势了。据说，在万县市西北约十来公里有个叫落函丘的乡村，那里的农民“主力军”（各行业中与学生组织“赤旗”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受到压制，便要求城里的战友们去声援。这一天，市里的“主力军”就去了几十个人，在人民公社的院子里刷了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炮轰公社领导的大标语。那“红色贫下中农战团”本就是在公社武装部的领导下以各大队民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办群众组织，此时见城里人来公社捣乱了，有人便下了命令，各大队的民兵就一队队地开过来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围住城里来的家伙们叫喊“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双方就开始大辩论，各说各的。然后，就有人动了手，乱成一锅粥。

“主力军”们眼看寡不敌众，就向市里求援。“主力军”司令部闻讯，立马组织援兵。当时汽车很少，群众组织还少有这类装备，性急的人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只能徒步行军，计划抄近路赶往落函丘。

当援兵们列队步行到苕溪河上的红星桥时，却遇到了“红联站”手挽手组成的人墙，将这必经之路堵得水泄不通。双方就各背诵各的“语录”，打起了口水仗。两边都在背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谁也不怕谁，都觉得自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的航道上奋勇前进，理直而气壮。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人就像两个聋子吵架——只说不听。

吵了许久，解决不了问题，“主力军”就有人喊：“冲过去！”

要想过桥的人就变成了潮水，呐喊着一波一波地往前冲。堵桥的人就变成了堤坝，坚若磐石迎风斗浪。那天我上白班，下班后我到原先叫福星桥、当时更名为红星桥的附近去看过热闹，只见红色工人兵团的战士们列成四五十人的横排，这些清一色穿工作服的汉子们从桥中间密密匝匝地直排到东边的马路上，手挽着手，将不足15米宽的石桥堵塞得严严实实，别说人，连耗子都休想从桥上溜过。桥西的“主力军”则是男女老少都有，服装也不整齐，东一簇西一堆地聚在各自的旗帜下，也没见有个统一的指挥。突然哪一堆人发作了，就齐声高喊着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去冲击人墙。堵截的一方则高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类最高指示，挺起胸膛进行阻挡。

冲一阵，过不去，就退回来。待一会儿，有一堆“主力军”发作了，又唱着语录歌去冲。此时对方早已将后队变成了前队，依然坚若磐石地抵挡着一波又一

波的人潮。我看了一阵子，就发现“主力军”们非但没有统一的指挥，人们都是各自为政凭热情行动。而红色工人兵团则不光有人指挥，且下面的战士都听命令守纪律。这也是当年造反派与官办保守派的明显区别。

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我睡在苕溪河下游的家中，还能听到相距约一公里远的红星桥头传来的歌声和喊叫声。

就在当天下午，也有些人抄另外的小路绕过红星桥，三三两两地赶到了落函。不光是去声援的“主力军”，也有许多是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我那刚小学毕业的小弟声远。但不管是去声援或看热闹，他们一进入落函，便被严阵以待的“红色贫下中农”俘虏。小弟后来告诉我，他和几个少年一起，被押进一个真正的牛棚里关了起来。当地人根本不听他们分辩，农民们说凡是城里来的都是“翻天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直到天黑后，那两位手执扁担守在棚外的农民被吆喝去公社吃干饭了，小弟他们才连夜逃回了家。

当时，亲历过“落函事件”的李森还是一个刚满 18 岁的高 66 级学生，他参加的组织是“红旗公社”（属赤旗派）。四十多年后，在市人民医院 CT 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的李森，亲口对我讲过他在“落函事件”中的经历。

1967 年 2 月 14 日那天，李森和同学们安静地在学校写了一天的大字报，他们没听到任何有关落函的信息。直到晚上 7、8 点钟，冬天的夜空早就漆黑了，他才和同学们一起步行离校回家。当这一群男女学生走到东方红广场时，就见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和空汽车。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说是有赤旗的战友到落函宣传《十六条》，被当地走资派蒙蔽的农民扣押了，我们应该去将战友们解救出来。这十几个还饿着肚子的学生们一听，马上就跟着激动了，根本顾不上各自家里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去吃晚饭。李森和同学们便爬上了一辆带篷的大卡车。李森说，那车厢内除了一个空汽油桶外，连棍棒都没有一根，绝无半点武斗的准备，大家都以为只是去辩论一阵便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直到每辆车都上了些李森这样临时凑合的人，就出发。浩浩荡荡地一共有 23 辆车，去的人多半都是赤手空拳。无组织无准备，碰上了就去了，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车队没走红色派设防的红星桥，经沙河镇上了那条又窄又烂的土路。颠簸着进了两边是山的落函丘。清冷的月光下，就发现前面的路上横着许多条石，就判断对方早已严阵以待。车队正准备往后退，山坡上又滚下来很多大石头，将后面的土路截断。车上的人正慌乱间，两边山坡上便亮起了许多手电，响起了阵阵恐怖呐喊，无数石头从天而降，砸得车篷和车头噼噼叭叭响，中了埋伏的人们就惊慌失措地跳下车往回跑。

李森刚跳下车，左后脑上便挨了一石头，鲜血马上便流了出来。旁边一位姓柳的女同学将手绢递给李森，还没捂住伤口，李森右脑上又挨了一石头，他说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便倒在地上。后来听说，李森昏倒后，同学唐先觉曾背着他往包围圈外跑了一段路。有三个手持锄把的农民冲了过来，将唐先觉打倒在地，

唐同学滚下了山沟，便顺着山沟跑了。被扔在地上的李森就落在了农民手中。

数十年后，李森还对当时的体验记忆犹新。他昏倒之后，并未“不省人事”。他说，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方，突然就看不见天上的星月和闪烁的手电，也听不到喊打喊杀的呐喊了。他说，自己没感觉到伤痛，只是非常奇怪，就想，我到了什么地方，为何没一个人，没一点光亮，没一丝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李森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背靠着一个谷草堆坐在地上。他不知道唐先觉曾背着他跑，也不知道农民怎么样将他拖上了山。此时，天上有一弯冰冷的明月，身边有同班男同学杨明富，女同学曾仁权。这时，他左脑上的伤口还在淌血。

第二天一早，据说是防止造反派来抢俘虏，李森和那两个同学被“红色贫下中农”用竹蔑条五花大绑，押着往大山深处转移。走出不远，走上一片冬水田的田埂时，他们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倒在田埂下面冰冷的冬水之中，这人的头被打破了，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变色。想来才被打死不久。

三个什么坏事都没干的中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就被竹蔑条五花大绑着“接力”转送，都不知道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受到怎样的处理。直到晚上，押送的“红色贫下中农”没给李森们松过一次绑，没让他们吃过一顿饭，还几乎将他们“处理”掉。好在当年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生命力正强盛，还能捱过去。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森们被押到了开县白果大队一位姓张的队长家里。被竹蔑条五花大绑地捆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学生们甚至连大小便都没有。押送者走了，那位根本不了解万县市情况的农村干部才给他们解开捆绑，让这两男一女在冷水中洗了洗身上早已结痂的血，忠厚的张队长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17日一早，张队长对学生们指示了返回万县市的方向，就放他们各自逃命了。返程的路上也还有风险，这些我也就不说了。其中的困苦艰险，就留给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退休李主任以后写回忆录时使用吧。但从李森和同学们的亲历，我也大体知道“落函事件”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谓“落函事件”是万县地区文化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武斗，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曾作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指责对方制造了“惨案”“血案”，打死打伤了多少革命群众，烧毁了多少房屋，破坏了多少国家财产。就连在不久后进行的“镇反”运动中，官方的文书也将这作为“主力军”的主要罪行。后来的武斗越打越厉害，所谓的“惨案”越来越大，“落函事件”就被抛在一边了。据我所知，没有人为这事件中的死伤者负过责。

第二天，我照常上白班。当我和王师傅干完活儿靠在粮垛上抽烟喝茶时，他就说起昨晚厂里的红色战团也奉总部的命令到红星桥去堵了半夜，他们如何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主力军”如何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经历过多少次冲击而巍然屹立，过不了桥的“主力军”最后只得作鸟兽散。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我内心一直是站在造反的赤旗派一边的，便对他的夸耀不感兴趣。只是我严守着在厂里不表明观点的自律，闭着眼听他吹。他吹够了，我的气也歇得差不多了，便去帮女搬运工背米，搞我的“义务劳动”。

## 文革中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一月风暴”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夺权后，除军队之外的国家机器几乎全部瘫痪。虽然上层建筑大半已经倒塌，但不少基层单位特别是企业，却在惯性地运转。在许多工厂里，生产活动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譬如我所在的精米厂。每天的任务没有减少，交接班正点准时。在乱七八糟的文革时期，如精米厂这样的国营小厂也并非特例。由于生产方式，再加上多年的严格管理，就有了“工人阶级特别守纪律”一说。

这年春节前，国务院发出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说是“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因此，当春节来临时，各单位都不放假休息，要“抓革命、促生产”。节日那几天，工厂的机器照常轰隆隆地响，人民公社的社员依旧顶风冒雪扛着锄头上坡，连肥皂火柴都需凭票购买的商店仍然开门营业……大家都在“促生产”。只有被夺了权的机关干部，停课闹革命的学校师生有时间去“抓革命”。

不知道是哪些“广大革命群众”有春节不休息的要求？“广大革命群众”是否还有其它要求？上边按惯例是不说的，广大革命群众也不必知道。

我记得1967年春节那几天天气不好，天空阴霾密布，地上稀泥不干。时断时续的小雨淋淋漓漓，寒风冷嗖嗖地刮着，大批判专栏上破碎的大字报抖抖索索。户外行人稀少，没人开会游行，也无人在街头进行辩论，整座城市冷清沉闷得又像回到了文革之前。

这是由于前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造成的局面。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家属”，谁都可以被对方说成是“改造得不好”或“坚持反动立场”，就可以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

当时共和国还没有刑法、诉讼法之类，所谓“依法惩办”就是依随时都可能制定的文件惩办。这个文件一出来，便弄得两派都有点人人自危。试想，经过那

么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整过那么多人，这些人又牵连有多少亲属？不管你是什么人，真要收拾你时，肯定能在你的“九族”中找出一个有问题的人来，你就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要受到“依法惩办”。这个圈子划得太大了！许多人都感到了压力，参与运动的情绪便有些低落，街市上就自然显出了冷清。

1967年2月初的春节，可能是有春节以来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我自然也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过了三天“革命化”的节日。

春节过后，天天在厂里挣表现想转为合同工的我，还是感觉到了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赤旗派的集会游行减少了，“一月风暴”中被搞得灰溜溜的红色派开始面带喜色。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关心政治运动的走向。文革开始几个月之后，因了造反派的闹腾，我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如果没有造反派了，不管我如何夹着尾巴做人，“阶级斗争”定会找到我头上来。当时有句流行语：你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事关切身利益，我便到处翻报纸寻传单，找参加了组织的同学朋友打听消息。

很快，我便从各种渠道知道了：

毛泽东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专门谈到“镇反”问题。这就令人想到了1957年“反右”时的“引蛇出洞”。不少相同内容的重要社论及报道，都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出，各大报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句，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命令。

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很快，“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虽然后来中央文革这一边又将“二月镇反”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革命都平反成了革命左派。但铁证如山，证明这不过是翻云覆雨。

这时，我就听说，由于城里面“主力军”人多势众，万县军分区要向重庆警备区借一支野战军来万县市进行镇反。2月中旬，果然就来了一支番号为7799的野战部队，许多人看见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乘坐数十辆军车，径直开进了军分区大院内，天天闭门学习。而军分区当时一直是公开支持红色派的。

### 向中雄最后的歌声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7年2月21日那个难忘的夜晚。

这一天轮到我上夜班，上班时间是 22 点至次日早晨 6 点。在家里吃过晚饭，又看了一会儿书之后，已近 21 点。我就不急不忙地步行去厂里接班。

连续好几天了，太阳就没露过脸。似雨似雾的东西时断时续，整座城市就像浸泡在愁云惨雾之中。大街上灯光暗淡，没有车辆经过，行人也很稀少。当我冒着寒风踏着泥泞走到环城路诊所门外时，突然迎面撞见了向中雄。

向中雄是我在一马路民办中学的同学，他中等个子，肩宽背厚，经常笑容可掬的方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时初中学生戴眼镜的还很少，同学们都昵称他“向瞎子”。民办中学在“大饥荒”中解散后，向中雄进了一个街道搬运队作会计。他自幼爱好音乐，不光是笛子吹得好，一把普通的二胡在他手中发出的声音也格外让人陶醉，使得他在本地的业余音乐圈就小有名气。但由于他花了太多的精力在音乐上，难免对本职工作有些影响，在搬运队就不大得意，听说早已被下到工班劳动了。

我记得，那天向中雄没戴帽子，他头发乌黑蓬松，穿一套挺时髦的草绿色仿军装，肩上挎着一个用红布做的语录小包，左臂上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什么文艺造反队的红袖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裤腿挽得老高，糊满稀泥的解放鞋上露出一截粗壮的小腿。我本想寒暄几句就走，但他却显得很兴奋，拦着我眉飞色舞地说他学会作曲了。他把我拉到街边物资局紧闭的大门前，借着门灯昏黄微弱的光线，庄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横格账簿纸来。纸上用钢笔写着岳飞那阙著名的《小重山》词及他给谱上的简谱。

我坦率地告诉向瞎子，我不识谱，还要去厂里上夜班。他却拉着我说：“不忙不忙，这是我今天下午才谱好的，我唱给你听。”由于光线太暗，他只得将歌单举到鼻尖下，轻声唱了起来：“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嗓音低沉浑厚，站在冬夜的冷街上，借路灯的微光唱古诗词，还真有点苍凉。我真诚地赞了几句，向瞎子一高兴便将歌单递给了我：“送给你，这是我谱写的第一篇手稿，待以后我成了大作曲家，它就价值了！”

我把那将来可能有价值的纸折好放进口袋，正欲告辞，向瞎子却神态严肃地说：“最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要反扑，你要当心点。”

我说：“我一个逍遥派，哪个会来整我？倒是你要小心点。”

他却马上昂起了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

当年，像我们这样低工资的年青人都还买不起手表。我不知道时间，怕接班时间到了，就不敢再同向中雄闲聊，匆匆拉了一下他的手，说了句改天找时间到公园喝茶，转身便走。

刚走开没几步，身后便传来他的歌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我回过头去。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向中雄强健的身影在幽暗中越走越远。眼看他渐渐被夜色吞没，只有歌声在身后飘荡。没觉察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我心中突然就涌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每逢大事发生之前，必有各式各样的预兆出现。但人们往往都只能在事后才认识到这些“预警”的信号。

### 我参加了抬尸游行

精米厂当晚还在正常运转，工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到得凌晨，我们那一道工序早已完工了，就听见围墙外隐约传来高音喇叭的叫声，隔得太远听不清楚。那年头这不是稀奇事儿，习惯于夜间工作的领袖说了一句什么话，全国人民就会连夜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那天，没人来向我们这些正在干活儿的人传达什么，我们也没在意，大家依然按部就班地完成着生产任务。

早晨6点，夜班下班了。但除了住在厂内宿舍的人之外，家在外面的人都没进厂来接班。我们不知原因，也不想问，劳累了一整晚，只想赶快回去睡觉。

不料我们才走到厂门口，便被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挡住了。他俩用枪口指着我们厉声吼道：“戒严了，不准出来，回去，回去！”

工人们都愣住了。马上便有红色派的小头目明白过来，兴奋地叫：“解放军镇反了，镇压‘主力军’了！”

我抬头一望，门外右侧的土岗上，有几个士兵如临大敌般蹲在那儿，身前架着一挺机枪。枪管和拉出的子弹带在路灯下闪着冰冷的寒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野战部队在城里戒严。后来听说，在凌晨刚开始戒严时，早已半瘫痪的公安局得到镇压“主力军”的消息后，一些警察欢声雷动。由于当年我们这种级别的城市里还没有专用的警车，几个兴奋的警察便爬上消防车，拉响警报出去协助军队镇压反革命。不料这响着警报挺能制造气氛的消防车还没开出一公里远，便被在大桥西头设置警戒线的士兵喝令停车。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除执行镇反任务的部队外，不准任何人上街，警察和消防车自然也都在不准之列。后来有人说是开车的警察没听见停车的命令，开得太快来不及刹车；也有人说是兴奋的警察和紧张的士兵产生了误会。结果，反正是戒严士兵朝消防车开了枪。不知当场有多少伤亡，后来也从未公布过。我仅确切地知道，一个熟人当警察的亲戚就是在那时被从消防车上打下来，成了主动去帮忙镇反的“烈士”。

出不了厂，下夜班的人都被叫进了食堂，听红色派的小头头自发地宣传“主力军”的罪恶。老工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议论：

“自古以来，哪有政府不镇压造反的？”

“敢造反，就要杀头！”

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食堂心不在焉地吃过早饭，还是不敢出去。过了一阵，有人进来说戒严的军人撤走了。大家便涌出了厂门。

天空中阴云密布，空气潮湿而寒冷。街边上绝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马路上虽然满地泥泞，行人却不少。时而有臂带红色派袖章满脸兴奋之色的汉子手提棕绳急步奔走，去捉拿本单位的反革命。

我刚走上环城路，就见到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壮汉推着一个穿旧军装的

青年迎面而来。那青年中等身材，很精干的样子，他虽然被棕绳五花大绑捆住双臂，却一边走一边犟着脖子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扭送他的人一边骂：“狗日的翻天派，死到临头了还嚣张！”一边用拳头脚尖往他身上招呼。这便是当年时兴的“革命群众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面。

我与这被扭送者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个退伍军人，转业到一家工厂作锻工，业余时间很爱唱歌。30多年后，他夫妻俩拥有了自己的工厂和一家宾馆。为改一部电视剧本，我和建成在他那郊外的宾馆住过几天。一次同他吃饭时，我提起了1967年2月22日清晨目睹他被扭送时的英勇表现。他却摇着头说：“那时年轻，喝了迷魂汤一般；不提了，不提了，喝酒喝酒！”

且说2月22号早晨，我走到电影院，门外的空地上正有一个胖胖的女学生在人群中演讲。臂戴赤旗袖章的女学生泣泪交流地说，凌晨，戒严部队冲进了设在天主教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里面的人全抓起来了。天亮后，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闻讯，就集合了学生出来游行，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他们闯破了层层戒严线，最后想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不料戒严部队就开了枪，打死了许多人……

她还没说完，就有几个“红色工人兵团”的汉子围了上去，指着女学生的鼻子骂：“你造谣，那些冲警戒线的家伙都是自己踩死的！你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攻击戒严部队，现行反革命！”就要将那赤旗女生扭送专政机关。这时，便有许多可能是赤旗派残余的人涌上去拦阻，推推搡搡之际，那女学生便一溜烟跑了。

真死了许多人？我半信半疑，就想到二马路西头的天主教堂去亲眼看看。

不料刚走到万安桥东头，悲壮的《国际歌》声便飓风般卷了过来。此时天上下着小雨，伴着寒风密密麻麻地洒在人们的脸上身上。我看见有数十面高举的战旗从对面涌上了大桥，旗帜后面是“狂飚文艺造反团”的管乐队在愤怒地吹奏。紧接其后，是二三十块躺着尸体的木质语录牌。每块语录牌都由4个人放在肩膀上扛着，合着乐曲沉重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再后面便是挤满了大街望不见尽头的人流，男女老少都紧挽着手臂，迎着风雨高唱着《国际歌》，跟在后面缓步行进。

我看见游行队伍里人人都昂首挺胸，双眼闪烁着悲愤的火花。在斜风细雨中，湿漉漉低垂不动的战旗，语录牌上那些被雨水冲洗得苍白的脸，万千人沉重的脚步声，再加上无数条喉咙中发出的低沉悲壮的歌声，突然就在天地间形成了一种异常庄严肃穆的气氛，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人行道上围观的人们，不论是哪一派的，都停止了交谈，注目于语录牌上那些年轻僵硬的躯体。

我突然在抬尸的人里面发现了老友蛮子。语录牌的一角压在他的左肩，他边走边抽泣还大声唱着，雨水和泪水流了满脸。与蛮子并肩抬着尸体的是青年教师廖元善（25年后，热爱戏剧的廖兄作了万县市文联主席），他俩臂上都戴着“毛泽东思想呐喊文艺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抬的语录牌上躺着一具穿草绿色仿军服的青年遗体，胸前挎着一个装有语录本的红布包，头上的长发被雨水粘在脸上，看不清面孔。我大声问：“蛮子，抬的哪个？”

“向中雄。”

我脑袋里突然响起一个炸雷。向中雄？十多个小时之前，就在后面不到 500 米的街角，他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谈音乐。我胸前的衣袋里还放着他昨天亲笔谱成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却已变成了一具冰凉僵硬的尸体，仰躺在阴霾的天空下任冷雨浇淋……

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面的游行队伍，马上便有人从两边挽住了我的双臂，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跟随大家一齐唱着《国际歌》，昂首挺胸往前走。

游行在东方红广场的影剧院大门外结束。面对着整齐摆放在地上的一排排年轻的尸体，苍天已用雨水将他们冲洗得干干净净。我在向中雄的脚前久久地伫立。他面色苍白，浑身透湿，躯体好似也缩小了一圈。我希望他能突然爬起身来，继续同我大谈音乐。但耳边回响着的哀乐声告诉我，他再也起不来了！永远也起不来了！

我突然明白，我们总有一天都一定会死去；但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或如何死！21 岁的我开始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怖。

当时我在向中雄身上确实没看到伤口。但在 40 多年之后，朋友李森对我说：向中雄的妹妹亲口讲，在为哥哥收殓时，发现向中雄左耳后面有一个子弹射进去的弹孔，但未找到弹头的出口。

后来，我学会了向中雄谱的第一首歌《小重山》。现在我已年过花甲，还唱得出来那首歌。早逝的向中雄谱写的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歌，这天底下怕就只我一人会唱了。但那歌单手稿，却因后来几次被抄家，失落了。

### 真原堂的枪声与血字

后来，我随许多人去已被取缔的“主力军”司令部看了现场。在真原堂大门外狭窄的巷道里和对面大街的墙壁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密集的弹孔。在与真原堂有走廊相通的市招待所一间客房内，我们不光看到了墙上的弹孔，还看见有人用手指沾着鲜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五个大字。白壁红字，分外耀眼。那些弹孔一直醒目地存在了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填补抹平。

当时的高 67 级学生、后来当了梁平县仁贤电器厂厂长的郑洪林，知道我在回忆“二月镇反”时，于 2008 年 10 月 6 日发来以下信件：

……67 年 2 月 21 日晚，我住在与真原堂一墙之隔的市招待所，镇反时是被枪声和军队踢开门喝令举手弄醒的。对面房间没举手的一个学生被一枪打中肚子，后来，我看见他沾着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几个字。另一房间的一个人被打穿手腕。墙上一副语录“八九点钟的太阳”被打出好几个枪眼……

写作此文时，我从收藏家王茂灿先生提供的资料上看到，这个被打伤腹部后再用鲜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五个字的青年，不是学生，而是梁平农机排灌站的工人颜朝发，时年 19 岁。

事隔不到两个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里，对 2 月 22 日的事件是这样定的性：“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

但在30多年后出版的《万县市志·大事记》中是这样记录的：“1967年2月22日凌晨3时，万县军分区奉令镇反，宣布‘主力军战团’为反革命组织。上午10时许，发生部分学生和群众冲击驻军警戒线的骚乱，死亡33人。”

已任了两届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郑永松，当时是万县解放路中学高66级学生，解中赤旗分团的负责人。他对我讲：2月21日晚上，他和一些同学住在学校。22日凌晨，有人跑来说，军分区在镇压“主力军”，部队冲进了设在真原堂的“主力军”司令部，将熊道生（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万县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头头全抓起来了。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马上激动起来，不是天天在喊“坚决同主力军团结战斗在一起”么？大家就决定冲进真原堂去抢回被抓的战友，就马上进行上街游行的准备，有人还跑出去通知住得近的同学。

天亮了，解放路中学赤旗分团就打着旗帜出来游行。出校门时，才几十个解中的学生，但沿途有许多赤旗派的学生和职工自发地参加了进来。走过二马路时，人越来越多，队伍就成了见头不见尾的人流了。他们高呼着口号，冲破了一道道戒严线，最后涌进了真原堂所在的那条约3米宽的巷子。郑永松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说，当时人太多，都在大声吼叫，场面很混乱，在那狭窄的巷子里，自己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跑，已经被推着冲过了真原堂的大门，也没停下来。

突然，枪响了。人们都没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红卫兵开枪。郑永松的后肩中了弹，他醒过来时已被士兵拖进了真原堂。屋子里有死伤的同学，军人替伤者进行了包扎，然后送到了专区医院。给郑永松动手术的丁院长对他说，根据伤口推断，你是被“撞弹”，也就是打到墙上撞回来的子弹打伤的。多年后，郑永松对我说，没有看到对准人群开枪，是射到墙上的“撞弹”伤的人。

### 监狱里“反革命”人满为患

据说，军队奉命镇反，原本只限定“主力军”这一个“反革命组织”和以熊道生为首的一批主要头目，大约也就十来个人。野战部队在2月22日凌晨执行了戒严和抓捕任务后，便离开万县市撤回了驻地。但既然开始了镇反，我们这社会便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将其视为一场“运动”，人人都要参与进来。受够了赤旗派欺压的红色派更是兴奋，不用发动便积极参与“镇反运动”。他们也不管自己单位的对立派是否“主力军”，只要对方与“主力军”有过联系，便将其大小头目和所谓“跳得高”的骨干分子视为“反革命”或“帮凶”，捆绑起来往公安局“扭送”。赤旗派的学生领袖钟嘉钰、应维忠等高中学生也纷纷被捕入狱。

本已半瘫痪的公安局于一夜之间焕发生机，立即在旧轨道上高速运转起来。最初，凡是“革命群众”扭送来的家伙，问都不问统统收监。才不过几天，看守所里便人满为患，那些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囚室内，都塞了四五十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晚上，“反革命”们紧挤着躺下去后，谁都别想再翻动一下身体。几天后，再也塞不进人了，便将原来法院街早已搬迁的地区监狱重新起用，把一些“罪恶较轻”的家伙转过去关押。但对于像流水一般继续“扭送”着涌进来的“现

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场地还是有限。不得已，才开始对各单位不断“扭送”来的人先行询问一番，凡是家庭出身没问题，仅是一般成员的，便只得遗憾地拒收，让各单位带回去自行关押批判斗争。

为了腾出场地关更多的人，专政机关对已抓进来的人便想要从快处理。但幸亏才一个多月后上面就下令放人平反，否则不知又要造成多少冤案。我那位后来作过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朋友蔡华义，当年不过是个青年教师，在赤旗派内也只是一般成员，仅因“家庭成分不好”，抓进去后未提审过一次，便被内定判处死缓。当华义在平反时看到那份未及执行的判决书时，自己都不敢相信神圣的法律竟会如此轻率。

在这“红色恐怖”期间，凡造反派都是人人自危。胆大者纷纷外逃，上京告状。就是现在所谓的“上访”。胆小者怕又添个“畏罪潜逃”的新罪，只能呆在家里等着挨整。其实，挨整的人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都是奉命造反，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

我虽未参加过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但在镇反的当天因好友向中雄的死，冲动之下跨进了抬尸游行的队伍。在游行到东方红广场时，我见到路边人群中几个精米厂的红色派在对我指指点点。我猜想他们在说，这家伙在厂里伪装是个逍遥派，原来也是个赤旗派！我就担心再去上班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家庭出身不好，又确实被多人看见我参加了“对抗镇反的反革命大游行”。若真被抓进去，肯定是个“组织上虽未参加，但思想上参加了”的反革命。我就不敢再去上班了。那个月已经干了20多天的工钱也不敢去拿。

或许是厂里忙着收拾正式职工中的赤旗派，顾不上我这个临时工。也可能是看见我的那几位老工人宅心仁厚，没在厂里添油加醋出我的言语。反正，我虽然丢掉了这份十分珍惜的工作，厂里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那段日子，真是后来的大字报上形容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白天夜晚，处处都在游斗“反革命”，男男女女一串串被五花大绑着游街，或捆在街边的台阶上被批斗。入夜之后，城里更是异常冷清，偶尔有几个路人，无不是低头缩肩远避着灯光疾走。大街上“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大标语令人触目惊心。当局还印了一本宣传“主力军”罪行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小册子图文并茂，在首恶专栏里，我看到熊道生等“主力军”的头目，其中还有我在民中时的那位又高又胖的同学王达天，他竟是什么“五人核心小组”的成员。后来听说，他被内定判处死刑！

人人都尽可能地避免外出，更不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这种形势下，许多人虽然住在城里，却与孤身被扔在荒漠中一样孤独。人们不敢走动打听，朋友间都断了联系。当年莫说一般百姓，连市里部局长家里也没电话。都不知道谁被抓了，谁在单位挨批斗，谁又外逃了。

我在家里才潜伏了十多天，吃饭的问题就出来了。当时人年轻，挣得钱时先交生活费，然后就乱花，不知道积蓄，经常囊空如洗。我与大妈住在一起，她老人家只有每月父亲给的6块钱生活费，还替姐姐带着我那小甥女。文革开始后，

姐姐一家日子难过，小甥女的几块钱生活费也不能按时寄来。大妈就是想让我吃闲饭也吃不起。没办法，为了有饭吃，我只得出门去找活儿干。

一上街，便见到赤旗派的学生列着整齐的方阵，高喊着“请罪、请罪，向毛主席请罪”的口号，一队队在街道上巡游。这些被迫上街请罪游行的学生队伍比以前得势时反而显得更整齐，人人都阴沉着脸。学生们虽然合着领呼者在高吼着“请罪”，但任何旁观者都感觉得到，愤怒和委屈在他们年轻的躯体内汹涌。当局对此也无计可施。学生中参加赤旗派的比例太大。如我二弟就读的商校，他们年级就只有一个男生是红色派，虽然造反的学生头头被抓了，但在校园内，那一个红色男同学领着一群女生，任何时候都镇不住他们。

---

【蓦然回首】

## “革命化”的春节

黄肇炎

1969年1月21日，我从重庆大学毕业后，经分配来到云南燃料一厂。这是一家隶属于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生产雷管、底火和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按照毛泽东“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和林彪“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工厂建在陆良县的深山沟里。我被分在冲压车间当工人，劳动锻炼。

到厂二十多天后的2月17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春节。

过年，在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来说，是最有人情味的节日。老百姓都把过年看得很重，辛苦了一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休息一下，盘点一年的收成，希望来年能有好日子。不管多么困难，多么贫困，都要想尽办法搞点好吃的，穿件好一点的衣服，把年过得快快乐乐的。除了吃汤元（元宵）外，北方人要吃饺子，南方人要搞十几个菜，最好再喝点酒，这是过年的主要内容。

但我们的这个年，厂革命委员会正式下发文件，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革命化”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年初一要吃“忆苦饭”。

当时云南各单位的习惯，星期日、节假日里食堂是只开两餐的。大年初一这天上午10点钟，我就去打饭了。在厂过年的单身职工不多，食堂里空荡荡的。饭堂中央放了一只大饭桶，里面装的是苞米楂子（玉米颗粒）和少量米加苦菜叶煮的稀饭。苦菜，也就是青菜。因带苦味，云南人称之为苦菜。稀饭里放了盐，没有任何菜肴，连咸菜都没有。我那时正年轻，24岁的小伙子，不吃就要挨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了一饭盒，稀里胡噜地喝光。然后再舀上大半盒，一路走一路喝，还不到宿舍就喝完了。

我百无聊赖地过了大半天，到下午，肚子早就饿了。就再拿着饭盒，又去打饭。食堂里仍然是那只大桶，装着大半桶早上剩下的稀饭，不同的是重新热了一

次。因放有盐，稀饭已经有点“醒”了——即是饭和水开始分离。我如早上一样，舀了满满一饭盒，仍然是一路走一路喝，回宿舍。

有家的职工可以回家自己做，不受这个约束。

我刚到厂，除了有一个大号铝饭盒以外，没有锅灶，没有炊具。没有米，没有菜，不可能自己做东西吃。工厂地处山沟，只有一所小而又小的小卖铺，卖少数几种生活必需品。其他如饭店、餐馆都是没有的。小卖铺的售货员也是职工，春节也要放假，所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去哪儿呢？出门就是山坡、岩石、野草、松树。工厂离最近的村子2公里，离最近的芳华公社（现在叫镇）所在地5公里，离陆良县城23公里。如果进城，先要步行8公里到板桥公社驻地，再等候过路的班车。那个时代班车本来就不多，春节期间可能更少。回来的交通也是一样的。如果要在城里过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住旅店须凭单位差旅证明。我没有任何证件，连工作证都还没有办下来。天气又冷，出门也不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刚到厂，没有探亲假，再说，离家几千里，也不可能回家。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孤家寡人，冷冷清清。除了喝“忆苦”稀饭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好猫在“干打垒”（用土坯建造）的宿舍里，挨到晚上，早早地睡觉。

这就是我的大年初一。

这才是“革命化”的春节的第一天。

“革命化”的春节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内容，就是批斗“阶级敌人”。厂革委会下发的文件说：“不让阶级敌人过好年。”

这个时候云南省的文革运动，正是处于“划线站队”的紧张阶段。所谓“划线站队”，就是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为首的省革委确定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具体说就是以对前省委书记赵健民（被中央定性为云南省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是第一书记阎红彦，但他已于1967年1月8日自杀身死）的态度来划清文革的“路线是非”。凡是打倒赵健民的，就是站合（云南古语“对”的意思）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保赵健民的，就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一来，八二三派（简称八派）是正确的，站合了队。毛泽东思想炮兵团派（简称炮派）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有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又是在省革委的领导、支持和纵容下，八派打击镇压炮派那就用不着客气，不用温良恭俭让，只管下死命斗就是。

燃料一厂虽然已经成立了革委会，但完全是八派掌权，炮派靠边站。炮派的活跃分子早已被关进了“专政队”，被八派组成的红卫队看守和关押。建厂后为了保卫军工厂的安全，原来都是配备了枪支弹药的。八派掌了权，这些武器就归了红卫队，成了他们对炮派“专政”的武装。

我厂从 1966 年开始新建，这时还在初创时期，已有职工 500 人左右。人员的构成中，转业军人大约占一半，另外的是云南各县新招的青工，和从几家老厂调来的技术骨干、管理人员。另有家属小孩数百人。

大年初二这天。燃料一厂上演了一场批斗“阶级敌人”的重头戏。

早上，先在厂食堂开批斗会。要求在厂的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由各单位负责清查人数。如要借故不到，就要追究“阶级立场”问题。

会议由原厂长、现主持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安金章（革命干部代表，转业前是解放军正团级干部）主持。批斗会开始，一声令下，“阶级敌人”被押上台。主席台的前边一下子跪了两大排 30 来人。有原党委书记辛烨允（转业前是正团级）、现任革委会副主任（炮派代表）刘兴全、原政治处主任李培埠、原组织科长王宪章、原行政科副科长张长年、还有孔广严、郭潮海、唐家德等，大多数是转业军官。另有一些“有问题”的家属——几个妇女和一个老太婆。这些人双手从背后绑着，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罪名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二月逆流反军乱军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黑干将”、“牛鬼蛇神”、“逃亡地主”等，姓名上无例外地打了一把大红叉。这牌子是用近 1 厘米厚的钢板做的，有 10 多公斤重。往脖子上挂的不是绳子，是一根细铁丝，勒进肉里很深。“武斗黑干将”更吃亏，还挂着用废钢铁焊成的机关枪、迫击炮等，又有几十公斤重。他们后面各站着一个背枪的红卫队队员。

革委会副主任高云靖（八派代表、转业干部）先作主题批判，然后是各单位批斗发言。发言批到狂热处就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倒×××”、“砸烂×××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这时下面就动手动脚，有打耳光的，有用脚踢的，有用木棒打的。最厉害的是用枪托，一枪托下去，头上顿时就有血流下。血流在地下成一小滩。还有的血滴在挂牌上，红黑相映，红的是那把大红叉和鲜血，黑的是墨写的字。其中辛、李、张、郭等人被打得最厉害，血流得最多。

这些人，我基本上都没有见过，其姓名有的是从挂牌上得知的，也有一些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还听说，这样的批斗会已经开过好多次了。

批斗会开完，然后是游街。山沟工厂里没有街道，就游邻近的工厂和农村，叫游乡吧（这可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标准词汇）。负责游乡指挥的是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组长张志学，原是 724 厂（在沈阳）的工人。“阶级敌人”被背枪的红卫队队员押着，仍然挂着前面说过的铁牌及刑具。全厂职工、家属以及一些小孩共数百人，裹挟着“阶级敌人”，组成稀稀拉拉，绵延数百米的队伍。迎着寒风，举着小旗，呼着口号，从本厂出发，游经云南包装厂（本系统另一家国防厂，生产炸药）、龙潭村（离我厂最近的村子）、云南机器三厂（本系统的引信厂），再回到本厂，全程有七八公里路。村子里的道路很糟糕，还在田埂上走过几大段。有的“阶级敌人”走得慢了，就挨枪托，挨脚踢。



当晚，被以“逃亡地主分子”罪名游乡批斗的张长年的母亲，受不了这份侮辱和折磨，悬梁自尽了。她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从河南农村来厂是想跟着转业军官的儿子度过晚年生活。只因儿子“站错了队”，就遭此厄运。她一双小脚，头上戴着高帽，双手从后面绑着，脖子上挂着铁牌子，押着游乡几公里，一路还要挨打。叫人怎么受得了！第二天清早，人们发觉张老太太的尸身吊在厨房门外的屋檐下。春节期间发生这样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众人看到无不伤心。可在那个年头，有谁敢出来帮助处理呢？后来红卫队把张长年从关押的地方叫回来处理丧事。在押解人员的监视下，他忍住眼泪，喋喋不休地用看似革命实际上是遏止不住愤怒的语气对着母亲的尸身嚷道：“你与人民为敌，我软埋（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用棺材，只用软东西裹着埋掉）了你……”左手抱着母亲的遗体，右手用菜刀恨恨地向屋檐下的绳索砍去，将母亲放下来。然后在邻居的帮助下，用被子裹好，抬出去草草埋葬了。

——几十年后，张长年的大女儿（大学毕业生，原在郑州工作，从小由奶奶抚养，与奶奶的感情深厚）来厂，想要把奶奶的尸骨迁回故乡重新安葬。这时张长年已故，张家已经没有人厂里了，她四处探寻查访，最后也没有找到埋在什么地方。

春节完了之后，不少的人背地里发牢骚：“我们又不是阶级敌人，我们不是也没过好年吗？”

关于这件事，《9824厂志》是这样记载的：“1969年2月18日 召开群众大会，批斗‘走资派’，‘二月逆流反军乱军分子’，并游行到××15厂、龙潭村、××04厂，被游斗的张长年之母当夜上吊身亡。”（见《9824厂志》，云南军事工业志编委会 9824厂志编辑部，1989年6月版第9页。9824厂是五机部颁发的云南燃料一厂第一厂名。）

后来，每当听到有人叫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不由得会想起文革中亲历的那一次“革命化”的春节。

---

【书海泛舟】

## 作者与编辑的对话

### ——《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代前言

史 云

按：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已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编辑：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吧，这部书为什么要把张春桥、姚文元放在一起写成一部传记呢？

**作者：**

大家知道，汉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的人物列传，就有合传的写法，把进行过共同活动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例如《廉颇蔺相如》、《张耳陈余》。好处是互相照应，举一而知二。也有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社会地位、思想感情相近的人物，如《孟子荀卿》、《屈原贾生》，放在一起，好处是前后照应，更加突出人物的特性。我这部传记就是力图结合这两种合传优点的一个尝试，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无论从共同活动，思想感情，还是从个人经历、从属社会群体来看，都是非常相同的。

“四人帮”里，江青虽然标榜“文艺旗手”，但本质上并不是个文化人典型，没有很高的文化品格，只是利用其特殊地位飞扬跋扈。王洪文，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代表，他的爬上高位，和本人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文革浪潮掀起来的一个社会渣滓。

张春桥、姚文元则有所不同，两人虽然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青年学生时代都喜欢文学创作，较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十八岁在上海就加入了“左联”，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时才二十一岁；姚文元一九四八年读高中入党时还不足十八岁），长期从事新闻和编辑工作，写过大批有分量的“文艺评论”文章，在文革前的文坛就有些名气。尽管我们可以蔑视那种“假、大、空”，专以他人为靶子的文章的水平，但谁也不敢小视那些文章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可以说，他们的崛起道路，是用自己一篇篇苦心琢磨迎合政治风向的文章铺垫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靠自我修炼“成才”的文人。按照过去的划分阶级成分标准，两人在各种履历表上填的“个人成分”也确实都是“学生”。和林彪集团的诸位“大将”相比，他们是“笔杆子”，称他们作“书生”也许是合适的。正如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所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毛毛《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所谓“书生祸国”，并非指“祸国”是因为“书生”，而是说这两个“书生”出身的笔杆子，干出了“祸国”的行径。实际上，这种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会里，虽然不是多数，但也不罕见，代表着一种政治流派，或者说畸形的文化群体。

说起两人的共性，有个近似戏言的比较。人们也许不知道，张春桥三十岁以前右眼就失明了，姚文元十几岁右耳便失聪了。在文革的十年里，几乎就是这样两个一瞎一聋，用仅存的“左”眼、“左”耳俯视天下、倾听动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两报一刊”之类文章，弄得天下不得安宁。

**编辑：**

是啊，我也有同感，不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如果气候合适，执掌了宣传喉舌，确实可以“以文乱世”，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你在书中引用的“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么，在你编写这本书以前，

已经有人分别写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记实文学传记，你这部又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称为“实传”？

作者：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在资料方面，过去已经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但严格地说，限于条件，并没有能够利用丰富的档案，较多使用了粉碎“四人帮”不久后中央印发的罪证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不完全、不准确的，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特色。我写张、姚传记的念头，虽然即萌发于此时，但也因为档案的原因，总觉得不够充实，迟迟没有下笔。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各种有关部门档案相继披露或经过努力允许查阅，才能给我们勾画出一副比较完整的传主形象。而在此之前，连一部比较完整的传主活动年表都难以写成，流传的种种说法也使我不敢轻信。比如说，张春桥、姚文元的出生年月日，过去都不清楚，遑论他们的青年时代活动了。这些正是传主人生里程的重要奠基阶段，不了解他们的过去，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后来。所以，这部传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首次利用了大批张、姚的档案资料，包括他们自己在若干年后的回忆、自传、日记、供词，填补了张、姚二人学生生涯、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参加革命初衷的大量空白，其中不乏许多有趣的细节，能让读者兴趣大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与此前出版过的一些文学传记（如师东兵凭空杜撰的《张春桥在狱中》）完全不同，是一部在史实上注重真实性的历史传记，所引述的事实和人物话语，都有依据，没有杜撰和推测、编造，因此相对而言，可称为真实的记录，故称之为“实传”。喜欢读“张春桥心想……”或是张春桥在狱中“策反”看押解放军小战士一类近似天方夜谭“故事”的读者，可能会失望。

当然，传主自己的回忆，是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的，但其中的一些“硬件”，如个人活动履历，一般结合档案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尤其是早期活动，做假的成分较少。因此，本书在选取时，也对传主的早期回忆着重引用，而对他们对文革时期的回忆，则有必要做大量的去伪存真工作。好在，这些年来出版的许多负责任著作，比如司马东去的《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就为我们披露了众多的有关张、姚文革档案。再如叶永烈的两部传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使用了不少有价值的口碑资料。应该说，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是在诸多作者锲而不舍的搜集、梳理、分析下才得以日益清晰的。因此，本书虽然披露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不少资料，我仍不愿说超越或否定了前人的话，只能说，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前进了一步。

其次，在评价方面，本书力图做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有人也许要问，张、姚二人不是已经被历史的审判钉在耻辱柱上了吗？还有什么“实事求是”的问题？不错，张、姚二人确可以说“棺”未“盖”而“论”已“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随之而来的更深刻的问题是：通过张、姚的一生，要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人物的？怎样防止今后再产生这样的人物（至少不让他们爬到影响全国的高位）？这些问题，依靠一次审判、一个结

论是远远不能回答的。

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一些材料和著作，都从历史的角度把张、姚描述成从小就坏透了的恶棍，一参加革命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说张春桥十五岁就参加法西斯组织，十八岁就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攻击鲁迅；说姚文元在高中读书就按叛徒父亲意旨伪装打入共产党内……且不从事实的角度分析历史背景如何，仅这种思维定势，就将一个严肃的课题引上了简单化的误区。似乎今后要防止文革的再演，只要严格审查个人历史档案，不让“阶级敌人”得到重用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加强“专案”工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仍然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当然，从写作传记的角度，这也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办法。然而，它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也不能发人深省。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867 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102 页）

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用大量激烈的语言怒骂各个资本家、地主，而是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在历史上包括现在有着推动生产的作用，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

同样，本书要说明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产生，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左”的错误环境里，才能使这种人得道升天。换句话说，没有五六十年代所犯的“左”的错误，就没有张、姚这样能够横行的“棍子”，没有文革，也就没有张、姚这样的祸国主犯。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阶级成分、早期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的。没有张春桥、姚文元，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也会产生“赵春桥”、“钱文元”之类。这也是一种“自然史”。而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改造好的世界观、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两面派的品质，决定了他们而不是别人走上了被审判的主犯席位。这是历史的偶然。

**编辑：**

你的说法我同意，毕竟，我们对文革这场灾难不能仅仅满足于“揭、批、查”式的总结。邓小平说过，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也是要求我们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那么，书中有什么具体史实描写是不同以往的呢？

**作者：**

如果读者能够理解并同意上述观点，那么你也就可以从本书中发现一些与过

去描述不同的历史结论。

例一、张春桥写“狄克”文章，是否奉国民党特务之命攻击鲁迅？书中用不少翔实材料说明：十八岁的张春桥加入“左联”后写对《八月的乡村》的评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主要是对鲁迅、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满，这是当时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阵营中的一次个人活动，是两个口号争论大潮中的一点浪星。这个问题他在延安和解放后已经有了犯“宗派”错误的检查，而非长期隐瞒事实。

例二、如何评价张春桥的两次加入中共，他是否“叛徒”？结合三十年代中期中共上海地下党各自为战的情况，参照其他人的证明材料及五十年代上海市委的组织结论，我们可以得出的分析是：张春桥第一次加入的确实是未与上级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组织，但说其是“叛徒”或“混入党内”，则是扣政治帽子。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来到延安，重新加入中共，其动机也可以作为时代的潮流所驱使。需要指出的是，他隐瞒了一些细节，试图把加入中共时间提前，是取巧的表现。

关于姚文元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的动机及表现，书中也根据事实做了描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这些写法，并非要为张、姚二人开脱，也即马克思所说“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而是想引起大家最终的一个思考：

《水浒》传第一回有个故事：“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华山进香，误揭了天条，放出种种“妖魔”，使得“天下大乱”。那么，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究竟张春桥、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们出笼才掀起了文革？还是文革的特定环境彻底摧毁了本来就流于形式的民主、法制“天条”，使得一些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是“坏人”的人野心急剧膨胀，得以为所欲为，终于变为“妖魔鬼怪”？

要回答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读者不妨读完这部传记后，自己思考。

---

【书海泛舟】

##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前言、后记

丁凯文

按：丁凯文著《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已于2013年2月由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 前 言

有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这些年来由于新的资料、文献和个人回忆录的面世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海内外都有不

少专著问世，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更多的关心的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关注这些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历史命运，或是集中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治人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发挥的作用。然而，军队在文革中自始至终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与文革运动密不可分。脱离了军队而单讲文革史，许多问题是很难讲清的。可是相对而言，有关军队与文革的关系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目前有关文革历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专门的著作涉及解放军与文革运动的关系，这确实是文革史研究领域的缺憾。

有关军队的文革研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笔者认为，一是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文革研究仍然处于“宜粗不宜细”的阶段，研究者们仍然受限于各种人为的限制，相关的研究课题自然无法得以深入进行；二是许多内容可能涉及机密，尤其是事涉军事方面的内容，有关的资料不宜或不能公开，研究者无缘接触从而导致相关的研究裹足不前；三是军队在文革前期全面涉入地方上的“三支两军”的工作，涉及范围不仅广大，且十分深入，时间跨度也较长，特别是全国各地情况各异，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结果也有极大的差别，这些都给研究者的研究带来颇多困难。

然而，如果研究者不能全面厘清军队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文革的研究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很多历史事件的过程就无法解释清楚。这就如同一个人在行走时少了一条腿，其前行的步伐也必然是跌跌撞撞、蹒跚踟蹰。笔者不才，乃文革史研究中的后学末进，惟愿以一己之力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抛砖引玉。笔者所述未必精到，所言未必准确，还望史家不吝指教，笔者不胜感激。

笔者的写作从文革前夕毛泽东针对军队的相关部署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军队为主导一举粉碎“四人帮”为止。笔者本着历史的良知尽量客观、公正地论述这一历史时期的事涉军队的内容，把握历史的脉络，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其实，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会重演的，这类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胜枚举。那么世人就应该从中认真地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只有正视历史而非掩饰或篡改才能真正引以为鉴。希望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给世人一份借鉴，让那段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不再重演。

## 后 记

自从2011年夏笔者和司马清扬的专著《找寻真实的林彪》问世后，笔者就开始思考下一步文革史方面的研究。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一课题曾在笔者心中萦绕多年，这些年来笔者一方面持续搜集有关资料，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和学术动态。笔者感到，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有所突破，仍然囿于传统说教，流于简单化、脸谱化、格式化，更缺乏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有感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希望在这一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个人微薄之力推进这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的

发展，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解放军与文革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不是区区一本小书即可包罗万象。虽然我们就文革中军队高层的动向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关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放眼全国，特别是鉴于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情况各异，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军队介入文革活动也千姿百态，甚至千奇百怪，我们无法用一刀切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其实，军队在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支左”和“军管”的过程都可以写出厚厚的研究著作。我们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到军队参与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介入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活动，完成各项工农业生产计划等，还要深入到各个部委、机关、厂矿、企业、广大的农村和学校，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宣队、军管会以及军代表们在文革中的具体活动、演变等，比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树立的典型——“六厂二校”。此外，各地的野战军、地方部队，乃至各区、县人武部门在文革期间的活动也都是值得研究者们关注的。所有这些皆非本书所能完整体现。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披露，更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更多的史学研究者的参与。

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一些学者和友人的大力支持，笔者特别感谢何蜀先生的大力帮助，何先生读过笔者的初稿后，不仅多次对拙作提出许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且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相关的信息，并在百忙之中为拙作作序，笔者感激不尽。此外，舍弟丁宏毅及友人李楹在资料收集方面给予笔者颇多帮助，笔者在此也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笔者还要特别感谢明镜出版社何频先生在出版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由此本书得以顺利问世。

文革史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是笔者坚信，这项研究还会继续深入下去，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

【书海泛舟】

## 筌路蓝缕 填补空白

——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

何 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不少骗人的假话，但他有一句话是实话，即他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因为他最清楚，是他把军队拖进了文革浑水，从他为炮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让江青“请尊神”开始，就已经一步步把军队绑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同时，在他为文化大革命炮制的那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也通过他亲笔加写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等文字，把军队明确列为了文革斗争锋芒所指向的重点之一。

大凡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对军队与文革的关系、军队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最

早的罗瑞卿案开始，文革中的许多大案要案，如此后的贺龙案，“二月逆流”案，武汉“七二〇”案，“王、关、戚”（主要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案、“杨、余、傅”案……直到最后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状态迟群、谢静宜（主持北京大学工作的两位军代表）案，无不与军队直接或间接有关。文革中不同阶段的转折，也多与军队有关：如中央军委、总政 1966 年 10 月 5 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直接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从而得以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心有余悸的广大民众真正蛊惑、发动起来，投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民造反狂潮；1967 年 2、3 月间各地打击造反派、几乎让文革刹车的“镇反”运动，主要依据的“尚方宝剑”是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而随后否定“镇反”、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新一轮造反狂潮，则又依据了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划时代的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引爆的全民思想大地震，不言而喻跟军队直接相关；至于结束文革的“粉碎‘四人帮’”，则更是在军队的全力参与下才顺利完成的了。在文革中，军队的影响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人必读的《毛主席语录》是由军队推出后向全社会普及的；学毛著运动和召开学习毛著的“积代会”、“讲用会”，是从军队开始形成风气蔓延到各行各业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国效法的样板，是毛泽东树立的八三四一部队炮制的“六厂二校经验”；当时最时髦的服饰是军装，最走红的职业是军人，最高贵最保险的出身是“革命军人”……从中、小学校到机关干部部的“五七干校”，全都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全国俨然成了一个大军营。

从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既然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么，这场名为“大革命”实为大动乱的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始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各级党政机关瘫痪、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并展开“全面内战”的时期，文革依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得到体现和保证？除了毛泽东等极少几个寡头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牢牢掌控着整个局势及直接控制北京和上海两个特大城市外，在全国各地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掌控局面。从 1967 年 1 月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特别是过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或化身出现的各级党委完全停止工作开始，毛泽东即下令军队“支左”，于是，各地军队（有的是大军区，有的是省军区，有的是军分区或地方武装部）的党委实际上就已经取代了原地方党委的领导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区的“领导核心”。

《毛主席语录》的第一页第一条第一句就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大动乱中，这个“领导核心”一刻也没有改变，只是具体的代表形式不同而已。除去北京、上海两个特殊地区外，各地在 1967 年“一月革命”中发生的夺权，都得到（或部分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或参与（只是有的得到了中央承认，有的没有得到中央承认，有的在得到中央承认后军队又撤销了对夺权的支持；而各地对原“专政机关”即公、检、法的夺权，则基本上都是



通过军管来完成的)；各地在夺权前后爆发的群众组织大分裂，也与当地驻军党委对待群众组织的不同态度密不可分（特别是被视为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只要得不到当地军队的支持，就会在造反派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而得到军队支持的则会屹立不倒越战越强）；从1967年2月下旬开始进行的“镇反”，各地都是在驻军党委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后来这些军区或武装部都不得不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批判“二月逆流”、否定“镇反”以后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也都是在当地驻军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局面下发生并且逐步升级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停火、交枪、大联合谈判，都是由军队领导人主持进行的，各种促进大联合、筹备三结合的学习班，都是由军队领导人主持举办的；各地先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都是以军队领导人为首（或为实际上的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整人运动，都是在军队领导人主持下开展的……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1972至1973年间，各地驻军领导人才陆续退出地方党政领导核心（有的直到1973年底或更晚的时候才退出），各地新建的党委这时才陆续由地方干部接任了此前一直由军队领导人担任的主要领导职务。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七年左右）里，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军队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就是军，军就是党。无论军与党，都是唯一的“最高统帅”、“伟大领袖”毛说了算。所以，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不研究军队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然而，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发生文革这片土地上不言而喻的研究禁区，军队问题自然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了。虽然中共宣传部门经常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来掩饰自己对舆论的箝制和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践踏：“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好像他们对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还十分宽容，并未设立“禁区”。然而，他们把所有的报刊、出版、广播影视直至网络都统统视为“宣传阵地”捏在手中，根本不容违背他们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发表、出版的机会，这样一来，研究还有什么“无禁区”可言？所以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几十年间，有关军队与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即使有个别学者不畏艰险、不计名利得失愿意作这方面的研究，也苦于档案的不解密等种种限制而难以遂愿。

在这样的背景下，得知丁凯文兄独立完成了这样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自然喜出望外。我与凯文兄通过网络联系上，已经交往多年，虽远隔重洋，未曾谋面，但借助于网络通讯“天涯若比邻”的力量，一直在文革研究中相互交流、切磋，他的严谨、谦和、执着，都给人深刻印象，使我获益非浅。几年前就知道他与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金秋教授创办了《林彪·军队·文革》网站（[www.linbiao.org](http://www.linbiao.org)），专门收集有关林彪事件及与文革、军队相关的文章，做了许多开创性、基础性、推动性的工作。特别是在2004年他主编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2007年又主编了《百年林彪》一书，在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上起

到了极大的突破禁区、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以后他又不断有新著问世。但是没想到他会忙里偷闲（本身有谋生的工作，还要在业余时间主持网站），又写出了这样一部具有筚路蓝缕、填补空白意义的新著，实在让人钦佩。

说起来，研究军队与文革，并非凯文兄的长项，他既未当过军人，又与军队无家世渊源关系，只是因为对林彪问题的研究而较多地接触到了军队与文革问题，使他经常有了想要深入研究这一专题的冲动。要研究这样一个大题目，对他来说，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他在无人愿做的情况下，本着突破禁区、填补空白的精神，大胆地做了，即使会有许多不足，许多缺失，其开创性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而且从他所写内容看，已经有了不菲的成果，因为他毕竟生活在真正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写作环境中，而且也能看到国内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从本书中的注释即可知道，一些最新出版的书刊他都能看到），加上他多年经营网站，视野开阔，结交了许多文革研究方面的志同道合者，相关的信息来源不少，这些都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给我发来此书的第四次修订稿时，凯文兄在信中说：“虽然每天上班挺忙，下班回家还要做不少家务事，但是业余时间埋头写作对我来说也充满了乐趣，觉得时间没有白白流逝，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人是充实而且幸福的。

2012年10月24日于重庆风江阁

---

【书海泛舟】

## 《倒下的英才》修订版前言

唐金鹤

按：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修订版）已于2013年1月由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我写《倒下的英才》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七年前在清华校友网上，见到了有关姜文波之死的文章，立刻使我回忆起四十年前陪伴姜文波姐姐的日子。我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写下了第一篇回忆文章《在陪伴姜文波姐姐的日子里》。写完以后，回忆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开了，四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连续多日彻夜难眠。

四一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从1967年4月14日成立串联会，一直坚持到1968年7月27日。团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没有想到，四一四自己也没有想到，四一四竟然能支持这么久。我原本是个逍遥派，居然深深地卷入武斗中，这也是谁都不会想到的。我目睹了清华武斗的残酷和血腥，我参加救护的就是那些面临死亡的伤员，太可怕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清华武斗的事情，包括我的丈夫郑楚鸿，因为这些回忆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想它。一直到我写这些回忆清华武斗的文章，我的丈夫才知道了我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我也才知道了他的左脚有残疾的原因，原来在五三〇大武斗时，他在东大操场上，老团的弹弓车抛过来的一块砖头打伤了他的脚。

我突然感到，如果我不把我经历过的那些事写出来，那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些事就跟着我一起消失了。不，不可以这样，这样做对死者是不公平的；对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民族是不负责任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必须正视的历史，想回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十亿中国人所演绎的这段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志，有人要回避，那是他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下来。

在众多清华同学和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完成了《倒下的英才》，以此纪念在清华园武斗中不幸丧生的人们。四年以后，2009年11月，《倒下的英才》初版在香港正式出版发行了。

该书出版以后，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专门发来邮件告诉我：拿到此书以后，他（她）彻夜不眠，一口气读完此书；四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又回到他（她）的眼前。接着，一份份勘误表发了过来，一件件往事的补充和修正数据从世界各地送到我的手中。大家一致要求改错、补遗。大家认为，这不是一本市井上流行的章回小说，来不得半点虚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后人的重要历史文件，不允许有一个字的差错。我感到大家把这本书看得很重，很重。我认识到，《倒下的英才》是我们这些人临走前交出的最后一张人生考卷，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答好这张考卷，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于是，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又欣然拿起了笔，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倒下的英才》的补充和修正工作。

但是，在收集资料、订正史实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想到的困难。对同一件事，几个亲历者常常有不同的回忆。我慢慢地明白了：身处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像游山玩水那样地左顾右盼，他们都是高度专注，盯着自己眼前的人和事；他们更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居高临下，俯视全局。比如五三〇那天，参加人数有几百人之多，而武斗的现场范围实在太大了。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演绎着不同的场景；而这些武斗场景是转瞬即逝的。于是，身处武斗现场的不同地点，就看到了不同的场景，就有了不同的记忆。更何况，四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场景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了，有些事情即使当事人都记不清了。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我曾看过一些苏军将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指挥同一战役的不同指挥官，对同一事件，居然会各执己见，互相争吵，甚至互相谩骂。”这些已经到了耳顺之年的同学们也一样，各个都坚持己见，不相退让，只是没有发生像苏军将领那样的互相谩骂而已。

为了使最后成书的数据可靠、可信、符合历史真实，我坚持下面三条原则：

第一，有争议时，孤证不取。如郑楚鸿一直坚持，五三〇凌晨，他看到了两辆土坦克。但是，没有人赞同。于是在初版，我坚持只写一辆土坦克。

第二，以亲历的资料为主。比如许恭生之死，他上午7点左右受伤、到下午在医院闭上眼睛，整个过程，我们只采用亲眼所见者提供的数据，并与也受了重伤的霍玉金的情况互相印证，找出许恭生真正的死亡原因，还给许恭生一个公道。有些人有意制造不同版本，说什么“被土坦克冲倒在地”，什么“血流如注”，全都是无稽之谈。

第三，各个亲历者所提供的数据，要互相印证。经过印证，去掉误会，去掉错认，去掉不合理的部分。如五三〇那天，老四的土坦克出动了三次，我们找到了三个土坦克的驾驶员；凌晨时分，同一辆土坦克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到了这时，在修订版中，我才接纳了郑楚鸿的说法，但改正了他的错认。

在材料的取舍上是不可以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我们对任何一个现场参与者所提供的每一点细微的材料都一视同仁，进行慎重认真的分析、讨论。我们欣喜地发现，众多的亲历者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在我和众多亲历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又耗时三年的修订版《倒下的英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我们写下这段历史，绝对不是为了争那个四十多年前的谁对谁错，不是为了争那个属于四十多年前的荣辱。我们早已跳出这些狭隘的框框，抛开那些对错与荣辱，这些东西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用？清华园的这段历史，对我们这一代清华人是刻骨铭心的，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这不仅仅是小小的清华园的不幸，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的不幸。它告诫我们，只有记住这段历史，才能不让那悲惨的历史重演；它告诫我们，人要以善为本，国要以民为先，要维护人的生存自由，要使大家都有做人的尊严，都安全、幸福地生活；它告诫我们，那些曾经对他的老师、对他的同学狠下毒手的人，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社会的谅解。不堪回首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使中华民族再也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为了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清华学子的神圣使命，我将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的喜怒哀乐在《倒下的英才》的修订版中尽显无遗，这是因为我深陷其中了。我与其他执笔者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所想、所做、所为。我们希望这些回忆能成为那个时代洪流中一个一个的小水滴，为那段历史作一点点补充。修订版中的一些章节在清华校友网上发表，征求意见。对于我们的忆述，有人感动落泪，有人佩服不已；有人震怒，有人扯下了斯文的外表，破口大骂。在国内广泛流传的电子杂志《记忆》第66期上，将本书即将出修订版而引起的清华网上的争论，列为2010年反思文革的10件大事之一。

我只是一个最终投向四一四阵营的普通群众，对文革的认识很肤浅，我写出的只是一己之见。那一段历史实在太复杂了，我们这些执笔者，大多数是老四，在这里写出的只是我们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没有能够记录下当年事情的全部真相和某些人在幕后的操作。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件，书中不可能涉及。因此，我们呼吁，参加过当年文革的过万清华师生，大家拿起笔来，趁我们还有记忆，共同

记下那段历史，使它不至于沦为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到目前为止，清华文革的脉路大致已经清楚；老团和老四们争论不休的是其中的很多细节。客观地讲，社会上的人们对这些细节并无兴趣。我想，我们也应该将我们有限的精力放到历史的反思上面，我们要揭露的是文革的荒谬，我们要思考的是民族的未来。

修订版《倒下的英才》中有几个重要修改：

第一，在初版《倒下的英才》中出现的“东大操场上，千人对阵”的提法是错误的。在此，我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并向对此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的李自茂等同学表示诚心的感谢。《倒下的英才》的修订工作就从调查1968年5月30日那天东大操场上到底有多少老四上场和老团对阵开始。尽管老四一方的数据现在要准确多了，但在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读者，因为无法得到团派同学的配合，修订版中团派同学五三〇上场的人数，是以上场的老四人员的感觉“老团人数比老四多”进行估计的。

第二，把目前流行的清华“百日武斗”的提法，改为“清华武斗”。

美国作家韩丁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为《百日武斗》。“清华百日武斗”的提法大概就从此时开始。2003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也沿用了这个说法；2004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的标题就是“百日武斗”，清华“百日武斗”一词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在初版《倒下的英才》中，我们也继续沿用了“百日武斗”的提法。

但是，在“百日武斗”之前，清华园里还有一场规模不小的1·4武斗。但樊同学在他写的《1·4武斗》的文章里指出：1·4武斗才是团派极端分子挑起的清华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也有人把清华武斗划分为“4·23到7·27大武斗”和之前的“小武斗”，认为1·4武斗只是百日武斗的前奏，属局部、个别事件。他们仍然都采用了清华“百日武斗”的提法。

在和一些同学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以后，我决定在修订版《倒下的英才》中采用但樊同学的提法，这样可以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清华武斗从开始、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因此，在修订版《倒下的英才》中，不再使用清华“百日武斗”的提法，而改为“清华武斗”。

第三，在《倒下的英才》修订版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照片。近年来，我多次往返美国与香港，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我感到港澳台与海外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误解。比如，他们把那个时期的大陆年轻人一概统称之为红卫兵，并把他们脸谱化，就是身穿绿军装、腰系黄皮带、手握毛主席语录，做出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近似魔鬼。我认为以不可理喻的“大陆红卫兵”来对那个时代生活在大陆的年轻人一言以蔽之是不合适的，这不符合事实，也有欠公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书中尽力收集了亲历者的照片，努力为读者提供那个时代

的真实景况。首先，我们尽力收集了他们在清华读书时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他/她们一个个都是风华正茂的好小伙和年轻秀美的好姑娘，并不是妖魔鬼怪；当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卷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相片记录下的是那个时候他们在清华园的身影。然后，是他们在清华毕业后，努力工作、事业有成的照片。他们不是就会武斗，他们是一群出类拔萃的社会中坚。最后是他们的近照，可以看出，现在他们生活得都很好，没有穷困潦倒，没有流浪街头。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把图片的一部分放入书中；而在磁盘中尽量收录了更多的图片。

在初版作者序中已经提到，考虑到多种因素，书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隐去了。在修订版中，有一位四一四核心人物的名字，我们以化名苏中代替了。但这些不影响本书的真实性。

本书封面选用传统的清华紫，书名用白色字体，以悼念清华武斗期间倒下的英才。

书中的 1968 年清华大学校园复原示意图由土建系建九班的肖春涛学友绘制。本书所附磁盘由作者的妹妹唐林鹤女士制作。画家温毅明先生为本书作画。土建系房零班的单建学友，以他一贯的严谨作风，为本书认真地校对。

为了帮助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阅读与理解本书，我们在某些章节中加入一些批注。这些批注绝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只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聪明秀出谓之英，英才乃才华出众之年轻人也。在这本书中倒下的都是我们国家之英才。俱往矣！喜看今日之中国，新人辈出。如果这些倒下的英才在地下九泉有知，也一定会为祖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更多的英才在成长而感到欣慰。愿这些倒下的英才安息吧！

2012 年冬于香港

---

【阅史漫笔】

##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胡鹏池

### 难于理解的一哭

1971 年 9 月 13 日晚，月黑风高，亲密战友乘飞机外逃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作何动静？没人详细知道。周恩来则吃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三天三夜没合眼。

消息最终是等来了：林彪及妻儿摔死在异国的沙漠里。

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慢慢恢复了平静，面色严峻的军机大员们渐渐地各自散去，偌大的大厅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和另一人（笔者注：此人可能是李先念）。

纪登奎回忆：“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地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纪的回忆描述得还算是平静的，有的文章却不平静：说是人散席凉，纪也正准备离去之时，“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从背后传来。纪回首一看，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他面对着墙壁双肩在不住地颤抖着。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这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举杯庆祝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的周恩来。”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吧！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一个参加了中共革命全过程，始终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历经沧桑的大国总理，一个资深的老革命家、大政治家，他的失声恸哭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不是“掩面而泣”。“掩面而泣”是一种克制的哭，动作小小的，哭声嚤嚤的，泪水当然也会有的，也会从指缝间流出来。

也不是“喜极而泣”，周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也不是“委屈而泣”，一般人在受了过度的委屈和伤害后会向自己的亲人、知己，哭泣诉说委屈，寻求理解、支持。

周的哭声很大很大。这种痛哭是在经受了长久压抑，压抑再压抑，终于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突然爆发的痛哭，是一种无比痛楚、撕肝裂肺般的痛哭。这种痛哭既不是为了诉说委屈，也不是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他的委屈太多了，堆积得如山高、似海深，却没有地方去诉说。他太需要理解支持了，却没有人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哭泣，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纯粹是一种真情流露、感情宣泄。有人说周的一生都在演戏，无论这种说法对不对，但这一次绝非如此。

他太苦了，比黄连还苦。一个 70 多岁的人，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干，做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都是“为别人擦屁股的事”，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做的都是“全他娘的叫什么事儿”的事！

他太冤了，比窦娥还冤。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时时刻刻没有自我，事事时时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看毛的脸色也就罢了，谁让他是他的老领导呢！却还要看他老婆的脸色，还得向她致敬，向她学习！

……

这个哭的内涵太丰富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历史上有过申包胥哭秦庭，孟姜女哭长城，诸葛亮吊孝哭周瑜……这些有名

的“哭”，都能说得清原因、动机、目的，不但说得清，而且比较单一。唯有周恩来的这一哭，说不清，它的内涵太复杂了，有委屈，有抱怨，有无奈，有惘然，有恐惧，有对时局更大更深的忧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哭可以类比。

这一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年，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包含了瑞金的八角楼、遵义的柏公馆，延安的土窑洞……

当年，周就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挨整的，挨整一年多，五次检查通不过。毛培养的新贵们，高岗、康生指着鼻子数落他，谩骂他，毛则在一旁不吭气，毛的脸色很难看。那时周就不止一次地痛哭过，当然是暗地里哭，小声地哭。

也包含了反冒进挨批评，毛威胁他说离右派只剩 50 米了。毛像一个恶婆婆，开一次会数落一次，短短数月内，他竟然做了 13 次检查。

也包括了刘少奇的专案，周在材料上写了那么一大篇注定要被历史否定的话。他在他的屋里踱来踱去，他明白他是躲不过去的，毛正等着他的态度呢！

也包括当初放下“老资格”的身段向全党推荐两个人，一个就是林彪，另一个是陈伯达。如今这两个人，一个死在异国它乡的沙漠里，一个关在秦城监狱里

他还曾多么丢脸地向林副主席做检查，多么丢脸地一再举手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有句歇后语：“猫哭耗子——假慈悲！”周不是的。周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不是猫，猫是另有其人的，他只是帮着老猫捉老鼠的，帮着吆喝，帮着驱赶。现在这只老鼠被赶得无家可归、无处可逃，居然飞到天上给摔死了。猫呢？猫却一点也不高兴，猫也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猫还没玩得过瘾。毛说：这个林彪，又没有人赶他。言下之意，这只老鼠怎么这样不经逗？

周也一样高兴不起来。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没有完，猫玩老鼠的游戏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只是不知道下一只老鼠轮到谁？

周的哭太复杂了，没人能准确地理解这一阵哭。

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段“黛玉葬花”来。

那天，天气不错，荷锄葬花的林妹妹将《葬花词》念了出来，她念着念着，不仅自己被自己渲染的气氛搞得悲痛欲绝，也触动了躲在假山背后的贾宝玉。“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周也面对这样的感伤局面：林彪死了，摔死异乡；刘少奇死了，死在开封，赤身裸体；贺龙死了，彭德怀死了，陶铸也死了……一个个都不得善终。革命，革命，继续革命，活到老，革到老，革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他能不“恸倒”吗？他能不痛哭吗？

即使他不哭了，他的心仍在痛哭。

### 出人意料的一喊

自“九一三”以后，毛的健康情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从林彪出逃的那个晚上起，毛就开始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更是缺氧而昏厥。特有的大中华的脸庞子明显地瘦下来，红光满面不再，神采奕奕全无，现在灰头鼠脸，恍如游魂，他的灵魂似乎被小林子魇住了。

毛的第二次昏倒，发生在1971年12月的某一天。

此时，在这皇城的一角，人大会堂的东大厅，泱泱大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正召集着会议。蓦地里心头一下咯噔了，一抬眼只见一位中年男秘书走进来说：“总理，你的电话。”周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就灰白了。周挥挥手说：“散会散会！”与会的高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全都想不知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周也不作任何解释，已然全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就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走上前去，搀着他的胳膊走进电梯里，明显感到周的全身在一阵一阵地发颤。“到游泳池！”周发话，声音同样是发颤的。张卫士心里一震，一定是毛那里出事了。周一坐上汽车，尿就失禁了。

车开到游泳池，打开车门，可周的双腿软得下不了车，于是张卫士和另外的一名卫士将周架了出来，先去侧室换下了尿骚气的裤子，自我镇定了一小会，端着胳膊走进毛的卧室。

毛卧室的门窗大开着，伟躯平躺在大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呜呼了，但鼻息间还有一丝游息。老婆小青儿，以及新宠、新贵们，眼镜张、胖子姚等也全都到齐了，全都面色严峻、神色漠然地在近处、远处，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描述的“打桩模子”般静静地僵立着，没有一个人管事，没有一个管事的人。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与呼吸机。好大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经过了吸痰，经过了人工呼吸，经过了护士的按摩，只见毛的脸色渐渐又有了血色，大口喘着粗气。

周坐在床侧，摇着毛的手喊：

“主席，你醒过来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你。主席！主席！”

周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的呼吸渐渐地平稳了，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那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转起来，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老毛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一幕与这一句。

设想一下，寻常人家当一个垂危的病人刚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周围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那些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人都会走上前去问候和安慰一下：

“您好点了吧？”

“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医生说你的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您太辛苦了，需要好好休息，这一阶段外面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有我们呢！你就尽管安心将养身体吧。”

当然，家属、亲戚、朋友中也有情绪激动的。

假如这是一个琴瑟和谐、相濡以沫之家，妻子会对老公说：“老公，刚才真把我吓死了，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叫我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呀！”

革命战友则会对他说：“老伙计，你可要坚强呀！为了党的事业，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也有的革命老战友也可能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心中不要着急，安心养病，让身体慢慢滋生一种力量。”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安慰的、关心的话都会有的，不能一一列举。

但是，有没有人问他：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存折藏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你可不能将钞票带到棺材里去呀！

或许会有，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他的不肖子孙，或是早已红杏出墙、给他戴绿帽子的妻。他们巴不得老灰物早点死，好分割他的家产，继承他的权力。而那个垂危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再次昏死过去的。

那么，有没有人对这位垂危的病人说：“你放心活吧！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或诸如此类的话？

想想！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

人性好的坏的都有，但似乎没有这样不通的人性。

哪有什么人会像老周那样对待垂危的老毛的？

“**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话？这像什么话？

难道周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没有人性吗？

恰恰相反，周是太懂人情，太懂世故了，他太了解毛的人性了。

《儒林外史》中有一段故事：家财万贯的老财主严贡生生命垂危了，临死前却迟迟不肯闭眼睛，他的心中仍然有他放不下的事。他的床前也围拢着许多家人，有的也像打桩模子般地竖着，只见那垂危的严老先生用尽最后的气力伸出两个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就是不肯放下来，众人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时，老先生的年轻的二儿媳挤向床前，众目睽睽之下，她将床头的油灯轻轻地挪近到老先生的眼前，然后又伸出兰花指将燃着的两根灯芯掐灭了一根，再在老先生的眼前晃了一晃。就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动作引起了神奇的结果，那严老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头一歪，众人近前一瞧，老先生已是毙了，走得是那么地安详！

原来，生性吝啬的严老先生是看着多点的一根灯芯而不肯咽下最后那口气。二儿媳的举动使严老先生安详地死去了。

周的话又使毛老先生兴奋地活下来，大权依然在握的毛先生又折腾了整整五年。

真的是“权权权，命相连”呀！

---

【阅史漫笔】

## 从乌蒙山到泰晤士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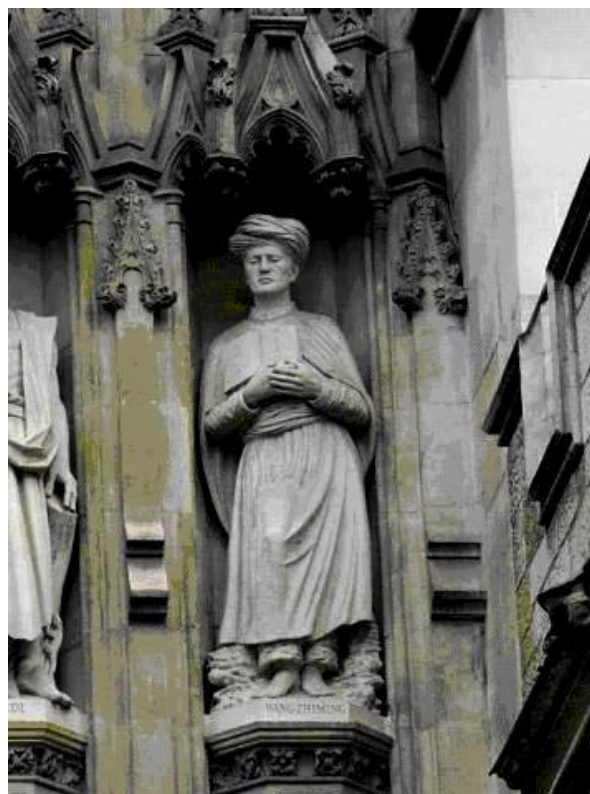
周孜仁

中译名“西敏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巍峨最恢弘的教堂之一，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紧邻著名的伦敦大本钟。西敏寺于公元 960 年（即赵匡胤登上中国大宋皇位那一年）扩建和改建，历经 105 年乃成。1540 年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此前 500 年间，西敏寺一直是天主教隐修院的教堂，之后又一直是国家圣公会教堂。英伦历代国王加冕登基、婚庆大典都在此举行，王室陵寝亦多厝于此。西敏寺还为众多英国乃至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辟留了永恒安息之所——从牛顿到达尔文，从乔叟、斯宾塞、亨得尔到狄更斯、哈代，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西敏寺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史书石卷。

你肯定不会想到，在伟人如此踞踞雄踞的殿堂，已然矗立着一尊云南偏远山区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塑像。

在教堂西大门，这位中国人和其他 9 位（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享誉世界的名人一起，安详地立于门楣之上（右图），接受全球朝觐者的景仰。人们称他们为“二十世纪人类十大圣徒”和“殉道者”。

他叫王志明。云南武定县下长冲村人。苗族。1896 年出生。1906，即王志明 10 岁那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万里来此，于远寂的莽莽群山中建了如农舍般简陋的教堂。现在已无法知晓王志明具体何时皈依了主？我们知道的仅仅是：38 岁，他成了当地土著苗族自己的牧师，还被选为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主持滇北



六族总堂联会。

事情的变化是从 1950 年开始的。新的国家宪法虽载明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远山教民的联会事实上是被解散了，以往的基督教活动都实际上被终止，教会被迫转入地下。

1969 年，全体中国人疯疯癫癫欢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那一年，某日，王志明正为一基督徒施洗，陡然被捕了。

1973 年执行枪决。行刑时他的舌头被刺刀绞碎。

这就是圣徒和殉道者的故事。

读到这儿，你难道不会想起耶稣受难？难道不会想起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士兵给耶稣强扣荆棘冠，残酷鞭打并最后将遍体鳞伤的先知血淋淋钉上十字架？耶稣是神之子，而王志明是实实在在的肉身凡胎。殉难时，他的舌头被同样肉身凡胎的士兵用刺刀绞碎，然后枪毙。他没能复活。

王志明的家乡云南省武定县，是云南乌蒙山区一个极小的、极不起眼的小县。而下长冲村之小，在幅员辽阔、无边无际的中国版图上，更是渺如浮土微尘。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草民，他受难（也如耶稣一般悲苦壮美），他死亡（也被愚昧如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武定百姓兴奋地围观），也就如漫山遍野的草芥被乱风掠过，自生自灭罢了，谁还会记得呢？

但是人类竟然没有忘记他。并且奇迹一样永远地记住了他：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把他记下了。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把他记住了。

大千世界，所有生命出现时，都同样渺小而卑微，然后走进漫长的、让人敬畏的历史，各自去扮演命运分配的角色，或精彩或黯然，或风光或平淡，或磊落或委琐……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坚守了自己有助于他人向善的信念，并且执著地前行，这样的生命就是值得尊敬的。王志明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能够像耶稣一样坦然面对强权者的暴力、酷刑和死亡。他注定应该和耶稣一样受到永恒的景仰。

初闻已走进西敏寺殿堂的王志明，于我，当比别人更多一层惊异。

因为王志明的蒙难和被杀，其时我是应该关注并惊骇的，但竟然麻木。

我当时正在云南最高权力机关——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且恰恰负责调查这方面的事务。1972 年，即所谓“林彪外逃摔死北漠温都尔汗”次年，温和派主政，号召落实政策。云南一大主题就是批判林彪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极左（后来又改为“实质极右”）路线。那一年，我去边山野地，和回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彝族……众多的野老村妇座谈调查，让当地政府“落实政策”：比如将改做仓库、会议室甚至猪圈的清真寺归还回民，允许多个民族恢复传统节日，恢复民族服饰的加工生产等等。

基督教偏偏不在此列。文革肇始前的 1965 年，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伟大领袖就已发了狠话：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只反革

命别动队。1972年我参加云南省落实边疆民族政策办公室工作，这句“最高指示”曾多次传达——那时依旧认为存在所谓“宗教复辟”。具体文件没有看到，但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曾多次出现。我们办公室一位公安厅原政保处长，也反复说到此事。因此我印象十分深刻。（不知哪位读者能提供那一“最高指示”的出处？）

杀戒早开。文革不过火上添油、推而极之罢了，因此在这方面无政策需要落实，恰恰相反，必须继续斩尽杀绝——这就有了落实民族政策的次年，圣徒王志明被刺刀绞舌、枪毙一节。

我1972年的全部工作笔记幸存至今，得以让我重新忆起当年旧事。时间是1972年10月6日。武定县委书记陈银贵给我们做了汇报。下面是当时的笔记实录：

宗教问题。这几年泛滥，有两个原因：1、原来对教牧人员实行统战，情况还好，文革批判打击这些人，敌人又把他们拉过去了；2、“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了信教群众，搞逼供信，群众反感，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们信上帝不好，可我们总不打人。”一些教民被抓，大家还凑钱送给家属。小石桥生产队队长信教，问他：“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只能信一样！”他说：“信宗教。”抓起来。群众说：“要抓，把我们一起抓走！”……

逮捕了一批长老，又封了一批新长老……

四所民办中学，一所的教师是传道员，三所是虔诚教徒，上课就上基督教，唱赞美诗……

今年虫灾严重，他们造谣说末日要到了，今年收庄稼，明年就收入了……

9个苗族队3个队是教牧人员和虔诚的教徒掌权……

在这些荒芜的文字草丛间，我寻到了王志明：

宗教活动嚣张。此地是撒普山总堂的一个分堂。每个队都有教会，有长老。晋城公社古柏大队大庆生产队17户、99人全部信教。长老张有喜，是王志明（牧师）被捕前封的……

1953年，王志明曾作为宗教上层，到北京见过毛主席……

接下来，圣徒的名字又出现了一次：

今年5-8月我们宣传队进驻，抄出许多1953年上海印刷的圣经……长老用圣经教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主题是世界末日。说硫磺火湖在燃烧，不信教的都要被投入……宣传队没收了这些宗教宣传品。宣传队走，群众就起哄……

王志明被捕后，三个儿子四处活动……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这位给我们汇报这些情况的县委书记是什么模样了，我也一点儿也想不起当初听到这个荒唐而残酷的故事时自己的感觉了。肯定是麻木了。从笔记里已能触摸到这个。如果恰遇了行刑当日我在现场，我想，难说我还不会被请上主席台，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为能一睹圣徒的被鞭笞、被杀而沾沾自喜……多可怕！

几十年后，我们都已知道，被那个血腥岁月送上死刑台的，远不止王志明一个。北京大学的圣女林昭，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信念献身的张志新们、遇罗克们，他们被处决时，不也被刺刀割喉、用橡皮塞堵了喉管吗？而且有人，至今还拼命要人们把这些殉道者及与之相关连的那一段历史遗忘。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与强敌的争斗，其实也是一种记忆与忘记的争斗。”

谢谢西敏寺！他们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同时把他们记住了，让我们流血的悲哀和负疚终于得以释怀。

西敏寺已千年不倒。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座伟大的建筑再过一千年、两千年也不会倒掉。圣徒王志明将和它一起留在那儿，让人们记住并且景仰。这样，人们也就记住了文化大革命，记住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还有一切为神圣信念献身的圣徒们。

同样，当人们站在西敏寺景仰和纪念圣徒之时，加害于他们的“彼拉多”们，将注定同时并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2012年10月3日

---

【故纸堆】

## 文革前夕的一篇科研成果报告

庄菁瑞 提供

提供者按：让几亿人狂热卷入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突然爆发的。此前持续多年的“唱红”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所有成果必归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我父亲庄育智（材料科学，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是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海归”博士。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写有一篇关于成功发明“钼顶头”（钼合金应用领域）的科研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是难熔金属研究的一项突破，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也是难熔金属应用领域里一项创造性的发明，填补了我国钼合金应用的空白）。对这样一项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用革命年代的“主旋律”语言和“突出政治”的“党八股”，报告了研究试制的过程。当我从父亲遗物的“故纸堆”中发现这篇文字时，曾为文中大量反复出现的、充满时代特色的语言和写作方式忍不住笑。48年过去了，从这些沾满历史灰尘的文字中，可以回顾、了解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是怎样的荒诞离奇，不可思议。

父亲那代人就被这样的“革命年代”耽误了大好年华。文革结束后搞研究写论文，他经常要查大学基础课的书，每到这时，他都会骂上几句，说是十年没干正事，连最基础的东西都忘了。改革开放后，他又能去欧美等国开会、考察，当他看见昔日那些没回大陆的校友，同龄的学人们个个风光，大房子，大汽车，显

赫的学术地位等等，他真的无语了。特别是有个当年的校友，我父亲在英国利物浦拿博士的时候，那人只是个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当时他曾劝我爸千万别回大陆。后来他去了美国，70年代末已经是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 研究试制成功新型金属材料——铝合金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 庄育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我是1952年3月由英国留学回国的。回国后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使我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1956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前后，我虽然读了一些毛主席的书，但是不够自觉。在党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近一、二年来，比较抓紧了学习，在学、用过程中初步尝到了一些甜头。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我明确了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1958年大跃进开始，所党委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带领几名青年同志占领金属材料中的一个新领域——难熔金属。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难熔金属是新的高温结构材料，它能满足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中对材料提出来的一些更高的要求。难熔金属和钢比较确实有许多优点。就拿强度来说，当钢融化成钢水的时候，难熔金属还保持有相当高的强度。因此无论在军用或民用上，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有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空间时代，难熔金属是一种空间金属，它是有广阔前途的。

我国难熔金属资源很丰富。可是在1958年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使我国科研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空白点。从目前世界情况来看，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由于自己对主席著作学习的不够，思想改造不够彻底，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曾有过思想斗争的。大跃进以前，我一直是研究钢的。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也培养出一些青年同志，可以说成果在望了。现在让我改行去研究难熔金属，感到有些“可惜”。后来在党委书记的谆谆教导下，又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才使我的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毛主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对照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我这种想法是不符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是一种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改行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就应该改行。在党的教导下，我对改行不再感到可惜了，反而感到责任

加重了。

新的工作，是一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战斗。但是，当时我的思想中还没有树立起敢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只想到国外学了些什么，就结合国家需要，摘一点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只有看家思想，没有创业的雄心。那个时候对洋人还有一定的迷信，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着保守的看法。譬如，我认为我们有不少东西一下子是不容易赶上洋人的，有些精密仪器我们在短时间内是造不出来的。在科学研究上，认为洋人的科学有基础，比我们搞得早，我们只好学习他们的既有成就，逐步赶上去。大跃进开始了，毛主席指示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打掉“贾桂”思想。党号召我们树雄心，立壮志，敢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党的号召和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这时候我想起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我想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比洋人差。外国人能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由于思想解放了，就有了一定的雄心壮志。并认识到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填上我国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点，有责任使祖国地下埋藏的大量难熔金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下图：庄育智当年工作照。）



难熔金属是一个很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包括了钨、钼、铌、钽等十几种稀有金属。开展这方面工作必须有所侧重，不能同时把每一种金属都拿来研究，究竟选哪一个，这对突破难熔金属这个领域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经过领导的启发和群众的讨论，分析了几种主要难熔金属，认为钼是比较有代

表性的金属。钼的一系列工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其他难熔金属就不难解决了。所以确定先从钼下手，先攻下难熔金属这个主要堡垒。

研究题目确定了，下一步就该开展工作。可是，当时我和几个青年同志都没有经验，实验室里一台可用的设备也没有，要查资料只有几份公开发表的文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面对这种局面，是干下去，还是打退堂鼓，我有些犹豫。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这段话使我明确了，我们就是为解决困难而工作的。工作必然会遇到困难，有了困难就需要去解决。只有解决了困难工作才能向前发展。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只要我能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走



群众路线，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思想改造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大跃进中，虽然批判了迷信思想，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就露头了。譬如：依赖欧美的洋拐棍是扔掉了，可是还有依赖苏联的思想。那时中苏两国科学院有着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我们的党委书记根据这个协定曾去苏联，想从那里弄些资料，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满以为能拿回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哪知道，他们背信弃义对我们虚伪招待，具体问题上严格保密。我的幻想被打破了。党委书记指示我要靠自己，不依赖别人。我从实践中也认识到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争取主动。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教导，我想，要认识有关铝合金的一些问题就得变革它，真正的生活于试验铝合金的环境中，哪怕我最初是个外行，最后也会变成内行的。我决心放下科学家架子，走出办公室，和青年们一道动手搞实验，掌握大量感性知识，为总结经验提供条件。同时，青年同志的干劲反过来又教育和鼓舞了自己。熔炼铝合金需要大功率。我们的自耗电弧炉一开，所内其他各室和工厂的工作都需要受到影响。熔炼小组的同志坚持在清早上班或晚上下班后做实验，白天照常工作。七八年来一直是这样。在试验的初期我都按时去现场，和青年同志们一起做实验。有的实验在所外兄弟单位进行，我也尽可能争取参加。

真空自耗电弧熔炼，在没有掌握它的规律以前，是有危险性的。它的基本原理是将要熔炼的金属作为电极，以水冷紫铜坩埚作为另一电极，利用电极与坩埚底起弧所产生的高热（5000~6000℃）使金属熔化。据文献所载如果操作不当，电弧打在只有几个毫米厚的紫铜坩埚上，很容易将坩埚壁打穿。坩埚壁一打穿，外面的冷却水流入炉内，水与几千度的液态金属接触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国外曾经报道过好几起大的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第一次在1.5公斤真空自耗电弧炉试炼铝合金的时候，直流电源是由六台500安培的电焊机并联起来的。本来大家思想上就比较紧张了，再加上六台电焊机一齐起动发出震耳的声音，一时空气就更显得紧张，仿佛上战场似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我想我是题目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应该走在前面。我和青年同志一起在电弧炉旁边进行操作。在起弧一刹那，电焊机发出怪声，刺眼的光线突然从炉内射出来。情况的确十分紧张，我依然坚持在现场，直到试验结束。特别是共产党员王连东同志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竟敢骑在电弧炉上面操作，对大家教育很深。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掌握真空电弧熔炼的规律，事故不是可以避免的。

在摸经验过程中，我们曾经走了不少弯路，遇过不少失败，也闹过一些笑话。譬如：在开始搞铝合金的烧结时，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按铝的容易氧化的特性把预先压好的样品装在炉内，抽真空加热烧结。组内一位青年同志为了烧结这炉样品，在炉旁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满以为一开始就可以得出所需要的样品，哪知道打开炉盖一看，里面像变魔术似的，样品不见了。我们在炉内到处找也找不到。样品到哪里去了呢？一时谁也没想出来，后来我们仔细分析，才知道是由于炉内真空度不够高，在2000℃左右的高温下，长时间地加热，铝一步一

步地被氧化，变成气体被抽走了，因而找不到样品。

我们就是从经验这样不足的情况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怕困难，逐步走过来的。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做了大小上百炉的试验，经历了许多次的失败，终于找到了制备钼合金的一套工艺，炼出了性能合格的钼合金，为在我国发展钼合金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仅做了大量的试验，还及时进行总结，写出了十几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曾在国际性的波兰第三届金属学学术会议上由我报告过，今年有好几位外国科学家曾来信向我们要这篇报告，我们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台有用的设备也没有，可以说只有几间空屋子。那时，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建设试验室的任务。走什么道路去建设试验室，解决这个问题，也有着复杂的思想斗争，也走过一段弯路。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开始我又想依靠苏联，我们搞到了一份苏联的真空高温硬度设计图纸，没有仔细审查图纸，就送去加工。这台仪器做出来后才发现在设计方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至今这台仪器还没有充分利用过。靠苏联的想法破产了。这时我又想到向国外订货。仔细一想，不行。一来要花国家大量的外汇，二来人家也不会卖给我们最新的产品，就算人家卖给我们了，至少也得二、三年才能得到订货，所以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另外我也想到了在国内市场购买的可能性，一想这也不行。因为我们搞的钼合金，在当时国内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所要求的仪器是高温，高真空，在我国科学仪器工业上正是空白点，显然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主席曾教导过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取得的。主席也曾号召过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中国革命的无数历史事实和大跃进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研究、设计、生产“三结合”。由研究人员根据试验的需要和综合文献上的情况，提出设计方案，由设计人员进行设计，最后工人进行加工生产。我们设计每台仪器都要经过多方面的验证，集体讨论。一台仪器制造出来后往往有许多考虑不周到的地方，需要在试用过程中不断修改，最后才能定型。例如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真空持久强度试验机就是经过了二、三次的修改设计，每次修改设计都经过具体、细致、认真的讨论。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工人同志们，一点也不怕麻烦，有时我们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一下子就给推翻了，从头做起，他们不仅没有怨言，而且非常认真负责。在研制过程中，青年同志们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不怕困难，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

我们就是这样在党委的领导下，在主席思想指导下，用了二、三年的时间，从无到有建设起了难熔金属力学性能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1958年里面什么也没有。1961年以后，已经装满了我们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如：真空持久强度试验机，真空蠕变试验机，真空高温硬度计等等。这些设备都是我们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搞出来的。

在我们发展出来的仪器中，已经有两台获得了国家三等奖。奖状、奖金我们

都交给所里了。因为，这是全所职工的劳动成果。

党号召我们，一切要从革命需要出发，要为社会主义建设着想。我们想必须主动地将我们研制出来的仪器设备推广出去。1964年我们派人到抚顺第一机械厂推广真空高温硬度计，通过我们和该厂试制小组的密切合作，在今年九月抚顺市按国家标准鉴定，已经通过并已进行小批生产。这项工作受到了抚顺市科委、工业局的重视，并已决定成立新厂，专门生产真空硬度计及其它新发展出来的科学仪器。此外，我们还去上海一家工厂推广了真空压蠕变试验机。据该厂来信说国家准备在今年把这台仪器送到国外去展览。

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使我们的主、客观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当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曾经伸手向洋人要经验要资料。现在洋拐棍扔掉了。我们有了一些经验，有了自己的资料，当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台仪器也没有，现在有了比较配套的仪器设备。从这些实践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毛泽东思想挂了帅，就会变无为有，变小为大，变弱为强，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一件法宝，用了这种法宝就会获得多快好省的效果，就会使我们的工作立于不败之地；它是促进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右图：庄育智〔右一〕与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薰〔中〕讨论难熔金属的熔炼问题。）



几年来，我和钼合金研制小组的青年同志在党委的领导下，在所内兄弟单位的亲密合作下，共同努力研究出制备钼合金的一套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根据毛主席“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总结了钼合金的工作，并决定把这项成果尽快地推广到生产中去，促进生产新高潮的不断发展。

我所党委非常重视钼合金的推广工作。党委书记多次作了督促、检查，并给予了大力支持。科学院党组也号召我们让研究成果下楼出院，争取早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但是，推广钼合金比推广新钢种困难得多。因为钼合金是一种新型的金属材料，它虽然有比钢高得多的强度，可是，了解它的人并不多，再加上我们还没有生产基地，推广就更困难了。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成果推广出去，我心中是没有数的。当时组内同志们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有的同志看到别的研究室正在积极推广成果，而我们的成果送不出门，就说：“难熔金属变成难用金属

了。”我是室主任，又是题目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压力很大，觉得必须扭转这个局面。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分析了一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光是困难，还有光明的前景。钼合金的优点，迟早会被人们认识的，只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缩短人们认识的过程。这样，我就鼓起了勇气，增强了信心。并用主席的教导鼓励青年同志。

今年初，鞍钢钢铁研究所派人找我们帮助无缝钢管厂解决一个生产上的关键问题——顶头穿不锈钢管效率低的问题。无缝钢管是用顶头穿出来的，顶头外形像个炮弹，大约 250 毫米高，有茶杯那么粗。很明显，顶头的好坏，直接影响无缝钢管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无缝钢管厂是用低合金结构钢做顶头的。每个钢顶头只能穿一根不锈钢管。不仅如此，钢管的内壁还不光洁，必须经过一道膛磨工序，才能出厂。成品率较低，据他们今年五月份的统计，成品率只有 65%，更突出的问题是钢顶头只能穿 4—5 米长的不锈钢管，不能生产 8—9 米长的长管。而我国国防工业、石油工业迫切需要这种规格的不锈钢管。用钢顶头不仅影响到不锈钢管的质量和产量，也给工人增加了劳动强度，穿一根得换上一个顶头。他们的加工厂生产一星期的顶头，只够穿孔机工作二、三个小时用的。有一次他们还发生了顶头供应不足的情况。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积极想办法解决。但几年来从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听到鞍钢的同志介绍这种情况以后，我认为用钼来做穿不锈钢管顶头，可能比钢好，因为钼比钢硬。所以我准备接受这项工作。但一想，不行，因为那个时候所内研究计划已落实了。要干，得增加计划。做成了当然没有啥，做不成可能就要受批评。再说，钼的价格比钢贵得多两三百倍，做坏了要造成很大的浪费。当时我想万一试验过程中出了毛病，影响鞍钢无缝钢管的生产，我能沾得起这个包吗？我想就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进一步想一想，觉得不对头。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虽然有不少困难，但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以革命利益为重，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为生产服务，我们决定接受鞍钢提出的任务。我把想法取得了领导的同意。钼合金小组青年同志也表示积极为国家解决这个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我和同志们热情很高，但是无缝钢管厂的实际情况怎么样，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该怎样去解决？心中没数。根据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我和几名青年同志，到鞍钢无缝钢管厂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现场，我了解到许多情况和问题。一个钢做的顶头在 6—7 秒钟内穿了一根不锈钢管就报废了，车间旁边堆满了一大堆废顶头。特别是当我看到工人同志们在高温和震耳的噪声中，紧张的装卸顶头，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了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给我的启发也是很大的。工厂的困难变成了自己的困难。我下了决心，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和工人们一道解决这个老大难的

问题。可是，在我心中又产生了新的顾虑：钼在高温下最容易氧化，若用它来做顶头，加热后，一见空气，钼会不会变成气体挥发跑了？我一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了解到由于穿管的过程很短，不但氧化不会太严重，而且所形成的三氧化钼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减少顶头与管壁的摩擦。同时也保护了管壁不受损伤。在这个具体条件下，钼的氧化，对穿管反而有利。有了这个分析，我的顾虑消除了，也增强了信心。

今年三月，我们去鞍钢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实验。这次用的顶头，尖端部分是用钼合金做的，其余部分仍是钢的。这样的顶头穿了二三根不锈钢管后，钢的部分就坏了，而顶尖的钼合金没有坏。通过这次试验，大家一致认为钼合金做顶头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用全钼的顶头做实验。

做全钼顶头必须先炼出直径不小于 100 毫米的大钼锭来。过去由于受到设备能力的限制，我们基本上没有炼过这样大的钼锭，这是一个困难。青年同志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带着这个困难先后六次学习《愚公移山》，千方百计想办法。为了用现有的炉子来炼出大锭，他们把电极由过去的四根钼条增加到八根，并加大了电流。这样熔炼有危险，稍一疏忽就会出事故。我们采取措施，制定了完善的操作规程，保证了冶炼的安全和质量。我们已熔炼了几十炉，基本上没有出废品。炼大锭的关是过来了，可是加工关还是没有过。过这一关也有困难，我们没有挤压设备和锻造设备。青年同志们同样地发挥了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困难，在东北机械制造厂借用了水压机，在风动工具厂借用了大气锤，在这两个地方进行钼顶头的挤压开坯和模锻工作。在准备挤压钼顶头模子的时候，为了减少所内加工厂的负担，主动给其他任务让路，我们到所外去搞协作。这样做往往要跑很多路，花很多时间。需要从所内把料拉到东北机械制造厂进行锻造，然后再拉到鞍钢进行粗加工，完了再拉回东北机械制造厂做热处理，而后再拉回鞍钢去精加工，最后再回到东北机械制造厂来应用，这样作几套模具就得用几个月的时间。

在兄弟厂的大力协助下，钼顶头终于造出来了。一九六五年六月五日早上四点钟，我由北京回到沈阳。到室后，来不及休息，就和青年同志们一道带着钼顶头去鞍山，下午我们在鞍钢无缝钢管厂开始了实验。第一个钼顶头一口气就穿出了二十多根 4—5 米长的不锈钢管。创造了该厂穿不锈钢管的新纪录，可是这个纪录，很快被更高的纪录代替了。这次试验的最高纪录是一个钼顶头穿成 48 根 4—5 米长的不锈钢管。平均每个钼顶头穿 32 根。过去每个钢顶头只能穿一根这样的钢管。更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在这次试验中还穿成五根 8 米以上的长不锈钢管。过去该厂不能生产这种产品。这样不仅为我国自力更生地生产长不锈钢管打开大门。而且也突破了苏联专家所说的鞍钢不能生产长不锈钢管的洋框框。钼顶头不仅穿管效率高，穿出管的质量也好。实验结果表明可以使成品率提高了 15—20%。用它穿管，和用钢顶头穿管相比，还可以省去一道机械加工工序。因为钼顶头穿出来的管子内壁很好，不必再加工。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在鞍钢无缝钢管厂进行了第四批试验，以一米管坯计算，平均穿一

百根后，钼顶头还能继续使用。这次成功的实验，无缝钢管厂认为完全可以正式生产。现在正准备接受冶金部和科学院的鉴定。

我们的试验成果受到了无缝钢管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欢迎。工人们看到穿了第一根管顶头还没有坏，就高兴地举起大拇指说：“好！”接连穿第二根管还没有坏，他们就双手举大拇指，喊：“好！”该厂在给冶金部的报告中说：1962年以来一直在寻找着做顶头的新材料，但是，没有找到。这回几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们说，应用钼顶头进行生产“将是生产不锈钢管的一个大革命”。

钼顶头要应用到生产中去，必须有生产基地。按过去做法，像这类问题应该由工厂自己去考虑解决。但是我想为人民服务应该做到全心全意，就应当像白求恩那样做到两个“极端”，就应负责到底。只要有利于生产，我就应该办。我想我们应该主动帮助鞍钢考虑生产基地的问题。所领导也积极支持我这种想法。所长亲自和我一起到鞍钢会见公司经理。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件事，我又向沈阳市科委作了汇报，科委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做法。并且马上派人和我们一道到苏家屯有色加工厂进行联系。该厂非常支持，但是这是一件大事，须由冶金部批准。我开始以为这件事在沈阳就可以解决了，没想到还得跑北京。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毛主席关于工作就是斗争的教导，决心到北京去办好这件事。我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科学院、国家科委汇报，又亲自到冶金部办理这件事。不巧，有关部门主管同志在开会，在场的一位同志见到我是外地来的，怕我等待不耐烦，劝我去王府井溜达溜达，下午再来。我哪里还有心思“溜达”，就在那等着。不久这位同志回来了，我把来意向他做了汇报，他很支持。当场我们共同拟好了一份下达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的文件。这件事就算办成了。鞍钢领导同志听到这件事后，对我们说：你们不仅主动地把成果送上门，还主动地帮助我们找生产基地，实在使我们感激不尽。我想，这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钼顶头的推广工作是一个集体的创造，在所内是由搞合金和搞加工的同志合作进行的。所外有鞍钢钢铁研究所和无缝钢管厂，还有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等协作单位，他们也付出了大量劳动，提供了很好的实验条件。新型材料钼合金顶头穿不锈钢管实验成功，这仅仅是钼合金广泛应用的开始。除了推广钼顶头外，我们与有关部门协作，正研究用钼合金代替玻璃纤维工业所急需的铂金坩埚，这项工作已有了一些进展。用钼合金做发热体，用锆刚玉作坩埚身代替铂金材料，能够熔化玻璃，并且能够初步满足玻璃纤维拉制工艺的要求。这一试验成功，将为国家节约大量白金材料。

钼合金材料的研制成功，是政治统帅业务的结果，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结果。我们绝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我们的工作。就难熔金属整个领域来说，同国外先进水平比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树立赶超的思想，与全国人民一道，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宏伟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根据中央备战、备荒、

为人民的指示，我们科学工作者，一定鼓足更大干劲，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材料的研究工作走到生产前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编读往来】

作者冯锡刚来信订正：

上期《昨天》发表拙作所加按语中称“正如本文作者所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其实这不完全是本人的说法，1993年8月由海南出版公司出版的山东师大教授魏建的专著书名就是《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本人只是在此说法上增加了“巨大”一词。

另外，第2页倒数第9行“玉磬”应是“玉罄”之误。系笔者粗心，谨向读者致歉。

李晓航谈文革文献资料分类

去年《昨天》第11期上，杜钧福先生建议对文革民间资料的整理提出分类方案，这个建议非常好。文革文献史料浩如烟海，内容繁杂，如何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科学梳理和分类，是文革文献收藏机构和个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曾经为了便于自己查阅资料，对自己掌握的文革文献作过大致的分类。我原来的分类方法是，先按块（行政区划）来划分，再按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但后来发现这样分类多有不妥。第一，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但其产生的文献却不能放进“北京市”里，应单独分为一类。第二，各省市区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没有具体地域界限，显得太粗糙，太笼统，不利于进行精细的地方文革研究。因为某地出现的事件，某地领导人的讲话，都发生在特定时间的特定地点，即使在各地党政机关纷纷瘫痪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每份文献的产生也都有其特定的“归宿”。这一点，在对文革文献分类时，应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将每份文献的具体发生地标示出来，才能充分显现文献蕴含的历史价值，也只有将一个地方散落的历史碎片集中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当地完整的文革历史图案。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整体文革状况和历史背景，没有地方感，没有信息根源，则难以与当地其他文献进行相互印证，也不易把握文献所透漏出来的点滴信息，更不利于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文革运动作比较分析。第三，文革从发动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按行业、按地方、按单位逐步推进的，文革运动在不同的行业、地方和单位，其发动的时间、进展的节奏、运动的方式和特点是不尽相同的，而了解某行业、某地方的文革，最简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该行业、该地方文革文献入手。所以，同一行业、同一地方的文献应尽量集中在一起，在分类时理应视作同一类别，不应分散。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行业、各地

方文革运动的发展脉络。不同领域的文献交叉在一起，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混乱和认知上的误读。

我在对文革文献进行整理分类时，尽量把握一个原则：既多角度、多层次反映文革运动，又便于研究者检索查找所需要的文献。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文革文献分作五大类别：

第一大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文件”。包括官方正式印发的文件，也包括各地选编的专题文件，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文件选编》等。

第二大类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如刘邓、贺龙、“彭罗陆杨”、“王关戚”等）的言论、批判材料等也列入此类。其中文革前乃至建国前即被打倒，文革中又被重新揪出来“示众”的前任领导人（如李立三、瞿秋白、高岗等），另辟子类“其他中央领导人”，与单个领导人并列。当然，这一大类不能囊括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因为并非每个领导人在文革时期都有单行材料印行。有则列，没有则不列，不开“空户头”。

第三大类是“中央、国家机关”。按行业分“党务、群团”、“文化”、“教育”、“宣传新闻”、“工业交通”等 15 个子类。为避免分类过于繁琐和不便检索，部门与单位之间不一定作为平行关系排列。如北京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由于北大在文革中位置十分显要，故与教育部并列。

第四大类是“军队、国防”。包括解放军各总部、兵种、国防科委等产生的文献。

第五大类是“省、市、自治区”。这部分文献最多。按行政区划分“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等子类，子类再分城市和专题两个递进子类，二者平行。城市类列出当地主要城市，将同一城市的文献集中按时间顺序排列，便于了解文献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该城市文革整体状况。专题类根据不同城市文革运动的特点和文献本身内容，将不同城市但属同一问题的文献集中排列，便于专题研究。例如山东省在文革中期“反复旧”问题十分抢眼，山东各地有关“反复旧”的文献统归“‘反复旧’问题”专题。湖北省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北决扬”问题曾引起高层高度警觉，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该省所有有关“北决扬”的文献，归入“‘北决扬’问题”专题。

以上五大类，应该大体能够涵盖文革文献的各个方面。

由于无任何先例可循，没有考察过任何图书馆、档案馆对这类文献的分类方法，缺乏必要的经验，完全凭着自己对到目前为止所收存文献的熟悉程度慢慢摸索和感悟，弄出了这个分类方案，其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重大失误。当然，一些细节问题尚需继续斟酌，对其中的条目也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官方内部发行的简报、期刊列入分类范围，但正式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机关报等，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容易查找，则无需列入。